

# 台灣民主運動的社會起因——七〇年代末期美麗島雜誌的形成

## 前言——重看二十年前的民主運動

以下文章完成於一九八一年七月的洛杉磯，於今僅作小幅度的修改，主體部分並未更動。當初提出本文的目的，一方面希望讓海外台灣人瞭解美麗島事件演變的經過；另一方面則提醒海外的台灣人不要過度崇拜為民主運動而犧牲的「英雄」，因此，也提出了一些溫和的檢討與批判，期望下一階段的民主運動能更成熟而充滿力量。在一九八〇年十月，我開始把此文翻譯成中文，分十次連載於《美麗島週報》。此一時期，因為美麗島事件主要領導人物幾乎全數遭逮捕，再加上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八日發生「林家滅門血案」，因而導致人心沮喪與挫敗。之後，加州發生了類似報復行動的爆炸案，而中國國民黨高官的家屬也因此受累；然而，也有些人則默默的忍受，並認為民主運動的變革步伐太快，激怒了國民黨，導致民主人士自食其果。針對上述現象、問題，本文企圖尋求政治衝突情勢變化的解釋，並盡量陳述說理，期待能撫慰集體創傷。

再者，本篇文章以社會學的方法，分析在一九七八——七九年期間所呈現的社會力。接著下一篇〈從民主運動到資產階級民主〉則著墨在十幾年後的台灣民主運動發展，即一九九一年以來民主進步黨的內部政治變化，我稱之為「資產階級民主」的階段。從前、後不同時期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出不同時期政治派系與人物的種種變化，以及他們如何成長、茁壯而至腐敗的過程。本篇將點出其重要的發展線索與重要人物。

上述兩篇文章都是以國民黨外來政權自一九四七年實施戒嚴以來，殘酷鎮壓大多數台灣人民的歷史事實為基本背景。以下簡要勾勒這段時期發展脈動，以期讀者立即大略瞭解本書的來龍去脈。

一九七〇年代，所謂「中華民國政府」的合法性問題，不僅未能消除危機，伴隨外交土的種種挫敗，反而出現了更多的挑戰。同時，媒體的批判日漸尖銳，而地方選舉也轉變為「反抗」成分。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的地方選舉，許信良、林義雄及張俊宏等人紛紛獲得選民支持而大獲全勝，同時，由於民眾發現國民黨作票舞弊，憤而包圍中壢警察分局，終於導致激烈衝突，造成事後聲名大噪的「中壢事件」，此泉很明顯喚起了知識分子與黨外政治人物的熱情與希望。當時，由於大家深怕被中國併吞，又面臨中美即將建交，因此，在此驚慌時刻，大家有了危機意識，於是如何以台灣自己的力量決定台灣的前途的想法成了主要的共同意識。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五日晚上，艾琳達與施明德舉行婚禮，更精確地說，這場儀式是一場政治聚會，在德高望重的雷震證婚下，同時也意味著民主鬥士的聖火，將由下一代來接棒。所謂的美麗島五人決策小組，即是在此時此刻形成。很清楚的，在五人決策小組當中，有四人是所謂的「台灣人新興中產階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開啟了民主政治的樞紐，成為民主運動先鋒部隊；當年十一月，許信良當選桃園縣長；張俊宏和林義雄當選省議員；國大候選人（當時選戰才剛開打）姚嘉文與林義雄則均具有律師身分。其中僅有施明德是軍人出身且經歷軍法牢獄之災——他被關了十五年，於一九七七年才被釋放。五人決策小組的成員年齡都在35-40歲之間，他們凝聚共識，開始全島串連整合反對力量，為一九七八年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做準備並造勢——這是民主運動發展關鍵的第一步。

在戒嚴時期的威脅、限制下，黨外助選團的生存條件，剛開始僅有立法委員黃信介提供的一層樓充當辦公室。但在總幹事施明德的主導下，助選團卻提出一連串震撼性的政見，任一政見都足以被羅織「煽動叛亂」的罪名而遭逮捕。其中最重要的是「十二大政治建設」——包括向當局要求言論自由；政黨退出軍隊、校園、工廠；（以農、漁民、工人為對象實施福利政策；全面開放中央民代選舉等政見。當時助選團的團旗，以緊握拳頭，外包一圈橄欖葉做為象徵標誌，拳頭表示人權的爭取，橄欖葉則代表和平。緊接著，黨外助選團加緊步伐號召各地方不與國民黨妥協的政治人物加入聯盟，其中包括一些自由派人士以及少數「左派」型的候選人，這樣的積極行動大部分都開始於首都城市——台北。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六日，為期十天受管制的競選活動展開，以數十位知名候選人為主角的造勢集會開始擴大，在接下來的幾天內吸引了數以千計的民眾參加，成為台灣人民第一次正面挑戰國民黨政權權威的群眾大會。

然而，時運不濟，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國總統卡特突然宣布自次年元月起正式與中共建交承認中國；國民黨趁此時機宣布選舉無限期延後。接下來，選舉被迫中斷，國民黨操控下的輿論界，不斷的製造謠言，充滿一片喊殺、喊打之聲，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國民黨甚至已將黨外人士的言論視罵中共的同路人，這是國民黨一貫的仗倆，也是抓人的先兆。直到此時，黨外助選團尚未瓦解，仍持續在運作。

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當天，在情治人員全面重重包圍之下，黨外人士集體連署簽名發表「黨外人士國是聲明」，前高雄縣長余登發決定以錢財資助黨外繼續闖關台灣民主大道。但沒多久，國民黨就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以「涉嫌參與匪諜吳泰安叛亂」之名，動員警備總部逮捕余登發。次日，黨外人士一行三十餘人南下聲援余登發父子，並齊集余登發老家橋頭鄉發動示威遊行，震驚了全台官方與民眾。這是自一九四七年國民黨政府實施戒嚴以來，台灣人民第一次政治性抗爭的示威遊行。接著，連續幾次的遊行示威過程中，都陸陸續續有數百民眾主動參與。

余登發被捕之後，黨外人士與國民黨雙方的衝突危機則不斷的發生。隨後國民黨以零星式的方法逮捕反對人士，並施以搜查文件、查禁刊物等手段恐嚇、威脅黨外人士；逼得黨外人士不得不展開一連串的保護措施，但括公開演講、遊行示威、發行刊物與地下報紙等活動，以期激發民眾關懷，希望藉著聚集群眾的力量，「警示」國民黨勿輕舉妄動，隨意濫捕黨外人士。

黨外人士一連串的反擊計畫與措施，真正的指揮中心仍然是隱藏在檯面下的五人核心決策小組。在事件與造勢活動相繼展開後，約有上萬名群眾加入各項集會或遊行，也因此在全島建立了聯絡網。實際上，在一九七九年六月以美麗島雜誌社之名重生的黨外助選團，其組成結構其實是一個政治團體。不到幾個月的時間，這個組織在全島擴展到十幾個據點，也進一步發展成站在第一線反抗國民黨當局的民間組織；另一方面，執政當局卻以狡詐的技倆，準備一舉殲滅黨外精英——故作協商與妥協的姿態和黨外人士拖延周旋，實際上有關單位剛從南非購買大批的武裝鎮暴設備，並發動反宣傳組織開始大肆抹黑他們，準備羅織入罪。果然，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在至少三萬餘人的目擊下終於發生了海內外皆知的「美麗島事件」，或稱「高雄事件」。

雖然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美麗島組織被瓦解，而主要領導人也幾乎全數遭逮捕；但是，由於國際視聽的關注，國民黨被迫公開審判「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審判期間，國際各大新聞媒體都派人來台採訪，而執政當局故意表示開明，對採訪軍事大審之新聞並無太大的限制；因此，台灣各大媒體（尤其是平面媒體）均能充分報導軍事審訊的過程。或

許，台灣經過此次「公開審判」的洗禮，對於整個社會的衝擊與引發的迴響，勝過兩年以來活動的總和。

總而言之，台灣社會自此已經開始有了新的公共自覺意識、批判思想與文化創新。當時施明德所說的「台灣已經獨立三十年」這句話，一時間已成為大眾耳熟能詳的口號，可見其影響力非同小可。目前，大家都認為這一階段的民主運動是台灣民主政治發展史的分水嶺。

## 導論

對外來的觀察者而言，自一九五〇年代以來，台灣的反對運動已成為由選舉、文宣，以及刑求、逮捕以及長期坐牢所交織而成的市民抗爭史。然而，在那段期間，實際上準備以武裝起義進行反抗而遭逮捕的事件，因為執政當局刻意封鎖，使大眾無法得知訊息，以致對社會的衝擊微乎其微。像一九六〇年代軍校學生的反抗事件就是一例。而在國民黨巧立名目，羅織罪名之下，被一般民眾所認知的「武裝叛亂」，事實上只不過軟性的和平抗爭活動，如一九七九年的余查發、「吳泰安事件」。後來，雖然美麗島雜誌社組織慘遭圍剿與封殺，但其民主運動的歷程似乎已匯集了長期反抗運動的動能，也象徵著反對運動的新希望。

由於種種情勢的轉變，在美國的台灣人常常會問：目前在台灣的民主運動領導人都被抓了，情況到底會如何演變？什麼時候才可期待另一次的民主運動？什麼時候才能再次匯集民主運動的能源？各式各樣的疑問與檢討之聲不斷提出，其中也不乏比較悲觀的反應：反抗有用嗎？任憑國民黨胡搞瞎搞吧！想圍剿就圍剿吧！

但台灣的這部抗爭與抵抗的歷史，並非是完全交疊錯綜的，反映出的也不只是台灣社會情勢的轉變，其實還包括國際局勢的發展。那些反對運動的領導者並非只是特異獨行，獨一無二的勇士；他們所代表的是社會趨勢的領航者，恰如冰山一角，由此帶領並影響著社會大眾的輿論。就此而論，我們可以分析出不同歷史階段（各階段可能相互重疊）的領導人，每一階段都有其各自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經驗，而不同階段的領導人也發展出各自獨特的心路歷程與行動模式。依據這樣的分析，即使沒有外在形式的顯現，我們也能在一般條件下預測出未來變化的方向。

構成對於上述問題的了解，乃來自一九七九年以來非官方的文獻資料，其中包括：1. 個人的直接經驗，2. 過去及現在領導人的聲明，3. 其他人對這些領導者的評論。雖然這些資料的收集有其條件上的限制，因為受訪者主要仍侷限在參與民主運動的人士，但總括來說，這個分析報告是坦誠且具有批判性的，同時也是個人的經驗反映。

就政治人物的言行，若僅觀察其外在行為及自我聲明，往往容易令人失望。對於一般人認為正當和道德的目標，大部分的都會施予口惠，就連國民黨都設有「中國人權協會」。可見領導人所標榜的口號，吾人應時時加以檢證，看看他們是否會為了短暫的目標與利益而把原則擺在一旁？再者，領導者之所以有能力領導，乃在於他們明確的表達出社會上大部分民眾的希望與需求：雖然如此，他們卻不一定能反映出那時期社會各方面的全部期望，特別是當他們所領導的是非當權派的反對運動。因此，這些領導人在某些情況下，或許也有可能不自覺的濫用本身所擁有的特殊角色。

總之，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在一九七七～七九年時期一直侷限於特定的反抗心態和所謂的台灣民族主義。舉例來說，像選舉期間的「民主假期」，台灣人民對外省籍統治

者根深抵固的怨恨等，都限制了民主連動的格局。甚至以目前的「後見之明」，仍無法大幅改變這種情況。當然，不可諱言的，過去的犧牲已帶領台灣的政治發展邁向新的階段，這種潮流無法逆轉。無論如何，只要我們用心的理解，過去民主運動的種種弱點，將有助於創造下一階段的民主前途。

前文所提乃提供一些基本背景的了解，接下來，將簡述台灣公開反對國民黨的四個階段，包括主要人物、事件始末以及歷史線索等。

第一階段，始自一九四〇年代末期二二八大屠殺以及國民黨政權以暴力統治的期間。當時的台灣傳統士紳不是被安撫，就是被剝奪權位，因而導致這些台灣士紳階級流亡海外，領導台灣獨立運動，例如成立於日本的台灣臨時政府。

第二階段則從一九五〇～六〇年代開始，一些地方型的政治人物，他們以挑戰國民黨的政權而得到大眾暗中的支持。然而，這些地方型的政治人物，鮮少能超越地方派系的格局；或是能夠脫離當權派糾結不清的恩庇體制。就因為如此，很少有證據能顯示他們對台灣民主發展有長遠影響。不過，這段期間也出現了一些民族主義革命色彩的團體——列如最近出獄的一些政治犯即是此階段的活躍人物。

第三階段則從一九六〇年代末期開始，當時有所謂的「中智階級」（中產階級出身的台灣知識分子）他們抗拒國民黨的收編，並與國民黨體制決裂，因而把反對運動推到一個具有理想性、普遍性以及開創性的新層次：他們公開要求國民黨改革，並且向國民黨政權提出改革的最後通牒——他們警告國民黨，如果做不到，將會面臨民眾大規模、全面的反抗。美麗島雜誌推動的民主運動是這一階段的最高潮。當然，這種民主運動所累積的能量已欲罷不能，就此伴隨而來的則是需要廣大勞工階級的支持，以便集結更多的力量面對國民黨政權的迫害與鎮壓。

在這種背景之下，台灣的反對運動出現了「新生代的社會主義式的台灣民族主義」（socialist Taiwanese nationalism）。第四階段於焉展開。與此同時，另一股力量卻代表著中產階級對社會變遷與不穩定的恐懼，因而原先反對運動之各式各樣的抗爭形式愈來愈少了。這兩股兩極化的力量也可以在反對運動陣營中看到，而台灣社會的工業化所帶來的社會複雜性及階層化則是反對陣營日益分化的因素之一。我在此大膽預測，雖然八〇年代的政治舞台仍將由「美麗島」後繼者承續的民主運動所主導，但上述的要素卻將成為突破政治局面的先鋒隊。

以下各章節將詳述這四個階段的主要內容。而本文主要的目的乃在提出一個分析架構，分別討論不同領導類型的社會起因和其行為模式；並提出一些簡要的例證，以便讀者參考。

## 士紳的反抗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變，使得日據末期整代的領導人包括受教育的士紳及工農運動的代表人物，或者被殺掉，或者逃亡海外，造成台灣人反抗鬥爭的真空狀態及失掉歷史經驗。殘存下來日據時期的台灣士紳階級，被國民黨以假冒的合理補償土地改革，強迫離開他們的土地。這個時期以流亡日本的「台灣臨時政府」廖文毅和辜寬敏兩人為代表，他們表現出以精英分子為骨幹的反抗領袖最後的忠誠。兩個人最後放棄反抗，回到台灣，保住他們的家產。不過這一方面也跟他們受不了留在台灣的家屬被逮捕騷擾有關。

我在一個場合裡直接認識這一類型的領導人物。一九七九年十月下旬左右，辜寬敏邀請施明德和我到他家共進晚餐。我們在美麗的陽明山森林裡找到他家。這是一座離馬路很遠的一幢日式房屋，屋前有小溪流過，上面跨有一座小橋。一位上了年紀的僕人在門口迎接我們，把我們領到房子大廳，與辜先生坐在一起。房子的佈置異常樸素簡單，但傢俱的質地非常高貴。辜先生穿著整齊，彬彬有禮，看起來十足貴族樣，他銀絲般的自髮襯托出一張光滑標緻的臉。他似乎很尊重，甚至於鼓勵施明德；兩個人談得很愉快，施明德自至終表現出友好的態度。那位老僕，眼睛不敢正視，恭敬的端了茶和甜點，帶著拖鞋劈拍聲，迅速地退出房間。我當時覺得他是已過了時的封建社會的遺跡。

我們快要告辭的時候，辜先生漫不經心的說了一句話，大意是，國民黨不如傳說中那樣壞，它保護台灣免受其他敵人（中國？）的佔領。隨著時間的過去，台灣人只得盡可能與國民黨相處，盡可能爭取到他們能爭取的。施明德和辜握手再見……當我們走出他家的庭院，施明德突然向地上不屑地啐了一口，向我發牢騷，「妳看到了他養一個什麼樣的僕人？」很顯然，辜寬敏高雅的談吐對他根本起不了作用。

一直到我離開台灣到了日本，我才知道辜寬敏被視為是台灣民族主義的叛徒，也聽到他被人咀咒，因為很多人的青春因為他的中途變節而被白白葬送。

我們或許可以這麼想，老一代士紳階級的台灣民族主義思想，多半是由於他們不滿家產被國民黨侵佔沒收而引起的。這些部分還健在，已經七八十歲的老者，大部分在北京受的教育，他們就像清朝時代地方士紳出身的讀書人一樣，想在皇朝的官僚制度裡尋求一官半職，尋常老百姓的問題一定距離他們的生活經驗很遠。這一代中的一些人，譬如說余登發和黃順興，就覺得他們自己是中國人，即使他們並不寄望在最近的將來與中國統一。

## 地方政客的崛躍起

一九五〇年代開始，台灣人開始參加國民黨政府舉辦的地方選舉。從地方~崛起的領導人，通常出身家境良好之家庭，或是地方上的生意人，他們教育程度不高，對於政治理論也沒什麼研究。一般對於這個時期地方政治領袖的評論都指出，外省籍的候選人教育程度比較高。當然，國民黨不承認日據時期的學位也是事實。本省籍候選人代表著地方利益，對抗貪婪掠奪成性的國民黨流亡分子。但這些台籍候選人同時也代表他們各自的家族利益。地方上派系鬥爭很難與反對外省籍暴政統治分清楚；任何一方都可以透過激烈的批評，煽起群眾的熱情，或者是變成國民黨恩寵體系的一部分，以求取本家的利益。即使到現在，恩寵 (Patronage) 仍是台灣地方政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特別是在大都市以外的農村地區。

恩寵暗示一種領導者和追隨者的階層關係；前者常常出身於家境良好的地主家庭，例如范政祐，後者常常是一些出身於鄉下小鎮粗獷但行動敏捷的農民、土匠、小老闆等，年齡在三十五或以上。因而，弔詭的是那些最不具有社會平等理念的地方政客，卻是最接近基層社區是且織的人物，不過這種基層的社區組織，也逐漸被新而都市化的工業秩序所取代。

這些地方領導人物所提出的政治論調對海外台灣人當是耳熟能詳——「台灣人很可憐，被外來者統治了四百年了。台灣人太乖，他們不知道怎麼說『不』。我們必須教育他們，讓他們去尋求民主與自由！」這種消極低調的訴求裡面含有家長式的權威及菁英主義的想法。他們在說，人民無力無助，沒有菁英的領導無法成事。這種論調強烈的反共，他們雖然也替受著國民黨農業政策剝削的窮苦農民呻吟，卻避免提出調整經濟的真體方案。

「我何必有一套為工農福利的政策？我甚至捨不得用一片麵包賄路他們，來尋求純正的民主與自由的理想！」

這批地方政治人物的心態，有的是光明正大與國民黨勾結的通敵者及機會主義者，有的則是公道的堅強維護者。但他們幾乎都只有個人化和地域化的世界觀，這也反映了一九七八年全島性對抗國民黨聯合陣線成立之前，地方性政治鬥爭的現實，這些地方人物常把對抗國民黨的鬥爭窄化為個人的鬥爭，個人的生存是持續鬥爭所不可缺的要素。因此，正確地判斷國民黨政權容忍異己的程度以及迅速退卻的能力，成為從事此種地方性政治鬥爭不可或缺的資格。同樣地，他們看待國民黨的壓迫，也強調這是個別黨員的貪污腐化，而不是國民黨有系統的「合法」的剝削制度。

一個人只要有一些資本，受過些教育，以及善於通俗性的演說，就能夠利用群眾對國民黨不滿轉化成選舉中對自己有利的資源。雖然台灣一般民眾看來似乎膽小怕事、噤若寒蟬，但他們還是默默崇拜著那些膽敢站出來的人，且私底下給予支持；這通常就足夠構成一股動力，驅使清白正直的本土男兒前仆後繼踏上反政府的不歸路（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抓進景美監獄）；或者，這也足夠讓那些並不是具有反抗誠意的人，合理化其自我膨脹的情緒。一旦當選民代，他就有辦法把反對派的位置變成搖錢樹。國民黨通常會以壓迫他人黨，或者是腐化他使他無法攻擊國民黨的方式，讓他及他的助手脫離他的地盤。

蘇南成就是個很典型的例子，也帶給我們很大的教訓。他在參選台南市長時，以敢言的「反對派」候選人著稱，一場選舉下來（他的許多助手，據說大多是台南神學院的學生，還因此被國民黨抓去）；但才當選不久，蘇南成就變成國民黨政權壓制民主運動的辯護人。對國民黨來說，他的行為比國民黨推出的候選人選上還有用。這證實了國民黨一貫所宣傳，如極右派的《疾風》雜誌聲言那樣：黨外是由一批「野心爭權分子」所組成，他們攻擊政府的目的，只是想操縱輿論，求取個人出風頭的機會而已。像蘇南成這種行為，無異進一步肯定國民黨內「自由派」那種刻薄而消極的論調：不管國民黨或黨外，任何人只要選上了，都會做壞事，每個人只為自己，而且應該為自己打算，黨外也不例外。政治是黑暗的，最好不要去惹它！人類本性不會改變，何必煞費苦心打倒國民黨？

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因在台北挑戰國民黨享有很高聲望的高玉樹，不久就被「踢升」更上層樓，出任院轄市台北市長，現在變成不管事的政務委員，他遠遠地離開了他的群眾。一位和高玉樹交情不錯的美國記者一九七九年曾跟高碰過面他。根據這位記者的說法，高玉樹仍然相信他在國民黨政權體系裡，替台灣人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是，雖然他現在的官位高高在上，他只是一名毫無實權徒擁虛位的人，出入均隨時有位外省籍的「秘書」隨侍在側。在民主運動蜂起的那幾年，我從沒聽說高玉樹對運動有什麼聲明，或私底下的接觸。

國民黨以吸收黨外人黨以及腐化黨外的方式，再加上偶而以酷刑懲戒一些倒霉的貪污小官，就維持了它進步及公正無私的外表。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八日高雄事件審判前夕，國民黨竟判處一名中年的外省籍警員死刑，罪名是：他收受新台幣三千元的賄款，而在一件非法墮胎案上放水（在台灣，法律上禁止墮胎，但台灣實際上的墮胎率還比出生率高出好幾倍）。但對於高級官員貪污的調查，國民黨去日常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最後無疾而終。

有勇氣的地方型黨外候選人，寧可冒坐牢的危險，也不肯與國民黨妥協。但這種人物常常把自己與國民黨的鬥爭個人化，好像全台灣只有他一個人有道德勇氣能夠領導反抗。他越被國民黨的特務系統壓迫，他越會像一頭被激怒的野牛那樣，死拚到底。這種對於壓迫的憤怒抵抗過程也是促使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政治意識覺醒的部分因素。但地方型黨外

政治人物對於壓迫的反抗似乎只是直覺性的，而很少深思熟慮。他的家人親屬也自然而然接收了他個人的政治資源，以彌補反對人物被奪公權的缺憾，這在傳統大家庭制度之下是可了解的。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初，施明德、我及一名美籍研究員到南部去，參加余登發在選前具名舉辦的募款餐會。餐宴設在一所學校的校園裡，五十張桌面一字擺開，農民裝束的廚師揮動大菜刀，剝肉攪湯，菜色看起來量多而質不佳。當時余登發所介紹的兩名候選人是他的女兒黃余秀鸞，以及余登發死忠支持者的兒子林應專——一位年輕、毫無政治經驗的大學畢業生。宴會結束之後，我們訪問了余登發，請他無拘束地暢談台灣政治。他長篇大論地述說廿年來他被國民黨政治迫害的經過，最後談到他高雄縣長任期內因為農地重劃問題被誣告貪污的詳細情形。他對於未來似乎沒有什麼看法，除了選舉之外，他也沒談到其他抗爭的形式，不過以他上了八十歲的年紀來說，這並不令人驚訝。他原本不願參加一九七八年全島性的黨外選舉聯合助選團，理由是這種助選團對他在高雄堅強的實力無所助益。可是在選戰開打一週後，助選團顯示出爭取民心的強大力量，他才欣然加入。

余登發和他的兒子在一九七九年一月被逮捕後，我們才看出他一手培養的余家班的勢力。為什麼這股勢力從未構成挑戰國民黨獨裁政權的進步力量呢？他的女婿高雄縣長黃友仁，不但為抗議余登發被捕的示威向當地警察局長道歉，一月廿二日當天，他還阻擾了橋頭示威遊行好幾個小時。本來黨外人士於一九七九年一月廿九日的遊行預定由高雄縣長的鳳山官邸前出發，後來卻作罷，黃友仁的反對是其中因素之一。

余登發的媳婦省議員余陳月瑛，則對余案的反應時強時弱，但當國民黨威脅要罷免她省議員的職務，並沒收她公公的財產時，她就不似起先般的強硬。她也阻止了黨外人士遊行慶祝她的夫婿余瑞言獲釋的計畫。很清楚地，依靠家族起家者，總是先考慮如何保持家族勢力，再來才會談到有原則的政治行動。

地方山頭的問題，除了表現出個人化的反抗格局之外，他們常常走入一種微妙的、詭辯式的自我辯護模式。他維持著黨外的立場，但也會接受國民黨的好處。因為他自己覺得他需要更多的資財從事反國民黨鬥爭，甚至他會覺得，在受國民黨迫害幾十年後，犧牲已足夠，他必須享受一下民選公職所能得到的好處。而國民黨的威脅更強化了利誘的力量。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蘇洪月嬌以人權、特別是她夫婿蘇東啟被判十五年政治牢為競選訴求，當選了省議員。蘇東啟被控勾結軍校學生，密謀推翻國民黨政府，建立獨立的台灣國。蘇東啟的北港鄉親以壓倒性的選票替他翻案，否決國民黨軍事法庭加諾的罪名，這也顯示北港民眾沉默但堅定地支持他在六〇年代所從事的抗爭。

蘇洪月嬌就任後不久，國民黨就翻出她以前經營旅行社的紀錄，羅織一項罪名給她。國民黨的嚴刑峻法規通常只適用於異議分子身上，這是典型的做法，蘇洪月嬌的個案也不例外，可是該案在法庭纏訟了一陣子之後，只差蘇洪月嬌的省議員身分沒被免除，就突然無疾而終了。另外根據可靠的內幕消息，蘇洪月嬌出任省議員不久，就向銀行超額貸款，蘇東啟還利用這筆錢與人合夥投資汽車進口生意，拆夥後，蘇還獲得一筆可觀的清償金。這種商業行為本身並沒有什麼錯，但這表示，公職都擁有一些特權，無論黨外或黨內人士均可加以利用。只是，利用了這些特權之後的黨外人士，就留下把柄，而容易遭受國民黨施壓。

蘇家個人化的政治行為還可以從另一方面明顯地看出來。蘇洪月嬌常常在黨外群眾大會一次又一次訴說她家人廿一年的牢獄之苦，這當然是她一生中痛苦的經驗，可是黨外人士數度抗議陳菊、余登發、陳博文或其他人被捕的集會，她也不曾出席。

我們因此而慢慢學乖，但又痛苦地了解到，就個人條件來說，政治鬥爭的代價極為高昂，可是個人式的抗爭往往不會導致社會問題全面性的解決。也難怪一些最築驚不馴的人迄今仍還關在綠島。話又說回來，儘管這種個人化的政治鬥爭有其侷限性及缺點，但這麼多人的犧牲，的確帶給台灣社會一定的政治覺醒。

我希望上述的一些說明，可以讓大家清楚了解，就滿足國民黨需要來說，「真」黨外與「假」黨外之間沒有明白的界限。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們無法期望，即使明確支持黨外候選人，還是不能充分宣洩民眾實際上的不滿情緒。

一般人對於選舉總是譏諧的成分居多，由於國民黨控制下的傳播媒體把黨外人士描繪成不懂建設性提案，只曉得搗蛋的破壞分子，更助長了這種對選舉諷刺的看法。事實上，國民黨把選舉搞成一種分贓制度，用以收買一批具有廣泛群眾基礎，卻沒有什麼政治理念的本省人，或是一批經濟大亨。國民黨把他們收編進他們整個剝削系統中，提供優厚的利益給那些合作的人。國民黨官僚利用這種方法，成功地贏得了中上階層台灣人的順從。國民黨政權的穩定性，部分要歸功於選舉作為一種「通氣閥」的效果，讓社會上的不滿得以宣洩，由一些微不足道、虛幻的甜頭來搪塞人民的要求，並不斷地敷衍，只要台灣人有耐心，終究會取得主控權。

不久前，一位數度受到國民黨提名，但同情民主運動的本省籍中年人士替我對台灣的政治作一番分析。他說，台灣是一個經濟民主制度。那些擁有金權的人可以自由地互相競爭，他們的呼聲也不會被忽視。只是他們必須把賺得的一部分，拿去孝敬外省籍的「封建霸主」；少了這批「政治保鏢」，這些人的財富旦夕之間可能全部化為烏有。國民黨只要求候選人是本省籍，這可以維持本土人士充分參政的表象；通常他們出身地方的經濟勢力，通常由家族支持；而且面目清秀、年輕，當時還有「崔、台、青」三條件（英俊、本省籍、年輕）。他們通常至少有大學畢業，小心翼翼遵守黨的路線，避免或者是不批評國民黨。國民黨推出的候選人並不需要熟悉國內政局，而且是懂得越少，越為國民黨所喜好。

我記得我在一九七九年中的一場婚禮宴中，遇見一位國民黨在前一年選舉所提名的年輕候選人吳梓。他說，他對於台灣的政治逮捕及刑求一無所知，但他辯稱，一旦他選上，他就會知道這種事，也會加以處理。我因此暗自稱他為「無知」，這樣比較容易記得他的名字。

傳統的黨外候選人也常常充做政治權力的搪客，就像出身非政治圈的金牛型候選人擔任經濟利益的供應者那樣。這個問題特別複雜，除非對這方面有親身的經驗，否則不易把握了解。這批捐客要求國民黨做出一些讓步，以此服務人民，但他們卻答應情治人員，他們會疏導及化解一般民眾的不滿。當然，選上民代的黨外人士並沒有什麼官方的影響力，因為不受法律約束的警察，掌有生殺大權，隨時可以摧毀他們。因而政治捐客的角色不易扮演，他必須有高度技巧，而且帶有幾分誠懇。立場太弱會引起民眾的不滿，立場太強硬則有可能遭逮捕。權力捐客不容許他人介入競爭，因為他必須獨佔調停的管道，否則就會破壞他充做權力販子的角色。事實上，權力捐客必須對政治規則非常熟稔，同時不挑戰既定的政治秩序。他的心態和地方型的政客一樣，他必須先求生存以便服務他的選民。

在這一點上，地方型政治人物及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特點有重疊之處（兩者在一九七〇年代台灣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將在下文討論）。上述的地方型政治人物，目前仍普遍存在於台灣政壇，只是不及新一批民主運動領袖耀眼而已。

## 體制內求改革的新一代台灣知識分子



一九五〇及六〇年代，如果台灣中產階級對外省人佔領台灣還覺得有什麼值得安慰的，大概只有聯考制度這一項吧。台灣的大學，在大學聯考制度下，至少同時開放給台灣人與外省人公平競爭。雖然帝王時代的科舉制度已停止將近一個世紀，但以教育程度劃分社會等級，以及視文憑為晉身官僚系統的重要憑證這種觀念仍然深植於東方社會裡。因此，很多台灣人似乎認為，由於台灣人佔絕對多數，台灣人有一天還是會攀上權力的位置。

當時本省籍的年輕民主運動領袖，大都在六〇年代中期畢業於台灣大學及政治大學，並且在早在七〇年代初，就已在社會中建立起一定的地位。他們學法律或政治，甚至到外國留學。彭明敏可算是這群人的前輩（一些年輕聰明學醫學、工程及自然科學的台灣學生，到外國留學後，就不回台灣——現在這批人紛紛投入「台灣獨立運動」，但他們太融入美國的生活方式，不是有很明顯的「運動」感。）

與前述地方政客作比較，這批新的台灣知識分子對於現代社會及一個有系統的民主政治制度具有比較寬廣的視野；後者尤其要感謝國民黨的教育制度。他們大部分出身於中低階級，甚至農家，靠著刻苦努力及天資，終於有成。這一代出生於三〇年代末期及四〇年代初期（一九七九年時他們的年紀約為四十歲左右），童年時期正好趕上一九四七年二二八大屠殺，以及隨著戰後低出生率和經濟失調，與一九五三年開始的嬰兒潮有所區隔。隨著六〇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的經濟急速的現代化，這一代似乎得到較大的教育空間，使他們得以從事專業及商業活動。

這批台灣的新知識分子大都先追求體制內的改變，他們似乎一度認為國民黨政府的一套法律規章可以真正地適用，可以做為爭取改革的根據。張俊宏和許信良都曾做過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幹部，他們還和其他外省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同加入《大學雜誌》。最先對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口號提出質疑者，就是該雜誌。張俊宏被情治單位及其走狗騷擾了十年，即使如此，到了一九七九年看來，他還是因為對國民黨完全幻滅而不知所措。呂秀蓮曾做過「行政院」的法律助理。姚嘉文和張德銘則是拿亞洲基金會的獎學金，到美國舊金山灣區唸法律，回台後才創設了法律協助中心。

這些人在政治生涯剛起步時，都極力避免對國民黨政權構成威脅性，在公開場合只談到社會運動與改革。譬如張俊宏讓國民黨內自由派人士參加《這一代》雜誌；呂秀蓮邀請國民黨籍的女性例如朱明，參加她舉辦的婦女演說及自我激發小組。張、呂兩人這樣做，是希望減輕國民黨的恐懼。

可是國民黨的態度並不如他們所預料。呂秀蓮成功的婦女動員招來國民黨旗下的婦女會的酸溜溜的攻訐。到了一九七八年底，國民黨新貴陳履安（陳誠的兒子）大幅刪改投給《這一代》的一些批判性的文章。因而情形似乎是這樣的；這批領導其後台灣民主運動的本省新知識分子，是因為逐步受到國民黨嚴厲的迫害，才逐漸意識到國民黨那一套廣泛而牢固的迫害系統，才與國民黨的建制疏離。

根據呂秀蓮自己的說法，在明白婦運每行動一步，運動的支持者、贊助人及志工都受到法律外勢力的威脅後，直至此時她才決定直接投入政治選舉。但我相信，多年前她在精神上即已認同台灣獨立連動的目標。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元月廿九日到二月五日間，張俊宏對林洋港欺騙性的說辭還一直耿耿於懷。當時國民黨的特務對余登發採取的法律迫害已幾成定局，林洋港卻以向是省議會同仁以及南投人的身分，要求張俊宏不要為了余登發事件而發動示威，以免使政府尷尬而「下不了台」。這種話通常是一些替國民黨善後的辯護者所提出的說辭。

其他大部分新一代的本省知識分子都留在學術圈內，抽象批評國民黨的政策。這種批評很少會踰越在官方贊助的討論會上發表口頭報告的範圍，而且也不會有行動上的威脅。很多人固然在一九七九年暗中幫助《美麗島》雜誌，但在表面上，他們與一些學術界裡面的「自由派」和暮氣沉沉的年輕外省籍知識分子看不出什麼不同。如果《美麗島》雜誌生存長久一點，他們或許會站出來，擔負更公開的角色。

## 中產階級的民主運動

我認為，新一代台灣知識分子投入傳統的地方選舉，相當程度改變了他們的觀點和行動，這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明確的台灣民族主義，其二則是動員群眾的民粹方案。基層的群眾力量引導他們觸及台灣民族主義的根，同時開始採取民粹經濟的觀點。這些都超乎他們個人生活經驗之外。但這不是說，他們從未替台灣人民尋求自決；這只表示，和所有知識分子一樣，他們所受的教育，以及他們的社會地位，使他們成為徒有中國化外表的三夾板，且限制了他們接收傳統台灣文化的經驗。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呂秀蓮表現出的兩種形象。一九七八年十月，她在台北國賓飯店舉行了首次籌款餐會，在會上她用北京話演說，腔態生硬。不過是一年多的光景，到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晚上，她已能夠運用帶有感情的台灣鄉土俗語，對一大群熱情的群眾演講。熱情昂揚的群眾，熱切地聆聽她以條理分明、邏輯清晰的態度，喊出人民多年來想要喊出的話：「台灣是屬於台灣人民的！（美麗島是咱們的！）」呂秀蓮幾個月來的恐懼在此一掃而光。此刻站在講台上的呂秀蓮以似乎震顫不已，但這是因為受到她與聽眾之間交織的熱切情緒而深受震動。

在新一代的台灣知識分子中，許信良是特別能體現知識分子放下身段，與一般大眾分享熱忱的人。他站在著民主運動發展的轉換點上，亦即，與地方政客及權力掮客劃清界線，有遠見的他也預示了運動的發展，他的見識甚至超越台灣的新知識分子。他的政治視野廣闊，台灣這個以出口經濟為基礎的現代化國家裡各階層選民都因此受到他的號召。桃園縣就是這種社會的縮影體；其農業部門因為要配合國民黨以農養工的政策，而受到擠壓；工業部門則依賴跨國公司投資，而靠圓民黨政權的戒嚴令及樣本工會維持紀律。

我曾經在桃園鄉下聽到一位國民黨黨員的家人這樣說：「我們投許信良的票，因為他替農民講話。」一些外資工廠的本地經理階層，曾在園區發起運動抵制許信良，但仍無法抵擋他對工人產生的魅力。許信良的哲學是民粹主義，只差一步就是社會主義；他也得到中小企業的支持，這從他創設桃園青商會可以看出來。

張俊宏曾在省議會（一九七八年元月十六日議會討論中壢事件）告誡國民黨的馬屁精及其支持者：「如果政府不合法，它就得提防人民有朝一日會自行執法……政府也不要以為，特務與人民之間的鬥爭，人民永遠是輸家。」相對於張，許信良的作法則更直截了當，他教導人民自己執行選舉法，防範國民黨舞弊——人民真的照辦了，他們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因抗議國民黨作票而燒掉一間警察局，還是台灣民主運動史上首度的大震盪。

從廣一點的角度來看，台灣民主運動可看成本省籍中產階級努力推動的結果。他們的力量隨著出口經濟的發展而膨脹，專業人數也在急速增加。他們推動民主運動的目的，乃是希望在國家政策上有置喙的餘地。《台灣政論》以及隨後的《這一代》都強調憲法的合法性以及台灣人的政治參與，而不像《夏潮》那樣注重社會問題。要是國民黨當初能照

這一批本省籍新知識分子所期望，採納建言，提拔他們至「中央」的職位，則這批知識分子在日後的政治發展中，可能會與下層階級漸行漸遠。

這批新一代的知識分子不知不覺中強化了精英思想幾種傾向，他們自認，資質不凡且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有權替大眾做決策，並使喚他人。因此，民主運動僅靠幾個核心人物間的共識來運作，對於主要幹部及工作人員鮮少作解釋或思想指導。有時候為了政治上的考量，他們也會否決進步的立場，譬如，姚嘉文就不願意《美麗島》雜誌編輯部為自由派的墮胎法背書。

這批新一代知識分子對於了解農民與工人的想法，只限於學術上的研究，而不是直接參與，或與工人農人討論他們的問題。他們通常似乎只想以相當表面的方式，爭取群眾的支持。《美麗島》雜誌曾試圖和工人接觸，並於一九七九年十月卅一日在高雄辦事處舉辦勞工座談會。這項座談會充分表現出他們下意識裡的精英思想及學院身段（留待稍後再敘）。但另一方面，民主運動領袖直接接觸具體的社區問題，展現出的潛力，在屏東的一次養豬座談會後相當明顯。當時屏東的警察甚至要脅，座談會若不取消，他們「不惜流血」以阻擾他們開會；但美麗島的反對人士不為所動。沒想到座談會舉辦一週後，經濟部忽然大發慈悲，決定救濟那些處於困境的養豬戶。

我之所以這樣寫，目的不在責怪這批民主運動領袖，而是在暴露中產階級領袖領導下的運動所面臨的困難；他們沒有經驗或機會去了解其他行動方法，也就不太可能超越台灣社會的思考特性。

國民黨當然費盡一切努力，隔離關心社會的知識分子和社會中的弱勢團體，或者是把知識分子的精力，導入無害政治的「心理輔導」計劃，譬如說救國團的「張老師」計劃等。一九七八年，由於工廠的暴力事件層出不窮，工人不守秩序的事件日漸增加，「張老師計劃」開始訓練大學生為工人做義務的心理輔導。當然，「張老師」所做的只限於強調如何使工人適應工廠生活。那年年底，連外籍社服機構以及本地的志工甚至都被禁。因此，像專門照顧弱勢團體的瑪利諾 (Maryknoll) 修院的神父及修女，以及經常採訪被捕雞妓的蘇慶黎和李元貞等人，都不能再從事活動。

但就我觀察所知，新一代認同台灣民族主義的知名知識分子，（年齡在卅五歲上下），鮮少有人認為和中下階層或勞工交談，有什麼重要性。

前面提到的勞工座談會（參見《美麗島》雜誌第四期、第五十二頁）由楊青矗（工人、鄉土小說家、黨外工人立法委員候選人）和蘇慶黎主持。所邀請的講員（從台北到高雄的旅費由「美麗島」負擔）包括學術界人士（黃越欽、張曉春、羅業勤）、具有勞工經驗或對於勞工出身的政治人物（康水木、王拓、嚴良昌、黃順興）及一位長期在外商電子工廠，擔任工會代表，但不習慣公開講話的王玉君小姐。

十月卅一日早上，美麗島高雄辦事處外面佈滿了警察及特務，同時，離辦事處二條街的大同小學裡面來了十二輛鎮暴車。顯然，國民黨對於中產階級改革力量串連社會不滿源流的這種組合感到焦慮不安。到了下午一點鐘，空間有限的二樓會場擠滿了二百多名工人，走廊上都站滿了人群，擠得水洩不通。

首先，黃越欽開始長篇大論的講解理論上工會的功能，但被一些年輕人此起彼落的喝叫聲所打斷。他們叫喊著說；「講台灣話！我們不懂國語。」然而黃越欽改用閩南語演說後，這批年輕人卻故意大聲嚼檳榔，檳榔汁吐得滿地。黃越欽的談話結束後，陳忠信對會場宣布，請搗亂會場者在三分鐘內離開會場，否則會對他們不客氣。這時候，在場的工

人群眾把十幾個顯然是國民黨派來擾局的搗亂者趕出會場，明確地表現出他們對美麗島人士的誠意，以及高度的興趣。然後座談會有秩序地繼續進行。

但國民黨實在不需要如此緊張兮兮。這批學者一談到問題，就不自主地對一些工人可能早就知道的事情下定義，例如台灣沒有獨立的工會，經理及安全人員掌有大權等等。因此會場愈來愈沉悶。輪到政治人物演講時，他們則口口聲聲的說，必須要這樣做，必須要那樣做，卻沒有明確指出如何做，他們只是希望能多拿幾張選票罷了，但每一個人都明白，在現今政治體系下，民意機關和工會一樣，充其量只是荒謬劇而已。儘管如此，與會者都很留神傾聽。

王拓在會中以堅定感人的語氣，呼籲工人團結起來，堅守他們的崗位，做社會改革的先鋒。在我聽來，他的話很誠懇，但正如象牙塔裡的學者一樣，王拓對於他所談到的事情缺乏具體處理的經驗。

最後一位發言的人是國民黨籍出身的國大代表嚴良昌，他從日治時代開始就擔任印刷工會的代表。只有他給會場帶來一點輕鬆幽默氣氛，他也顯現了真正的勇氣，並提到一些行動的具體方針。

到了下午五點，座談會的議程終於進入自由討論的階段。許多工人講出他們生活上直接碰到的問題，內容比上述那些學者要豐富得多。可是，座談會時間太長，到這時候大家都覺得悶得快窒息了，因此除了決定把座談會內容登在《美麗島》雜誌上外，並沒有提出進一步的行動計畫，就草草休會。

「美麗島」職員、座談會的籌劃人員以及講員到了這時都又餓又累，就到火車站附近的一家裝潢講究的飯店去吃飯。在講員回台北前，主辦單位請他們吃一頓，也是一種禮貌，與會人士並可藉此機會互相認識。但豐盛的酒菜，在杯盤交碰聲中一道一道的上來，賓主酒樽交錯，互相敬酒，根本無法認真談論問題。這回五桌酒席就花掉了新台幣三萬元，約相當於整個座談會的經費。用同樣的錢，可以供應全部參加座談會的工人每人一份盤餐，這樣自由討論可以繼續下去，還可以讓工人來教育我們。

## 反對力量在國民黨壓迫下結合起來

無論如何，即使在國民黨和情治單位的強大壓力下，本省籍的新知識分子仍試圖與群眾認同，並積極尋求他們的支持。他們這樣做，一方面求自保，另一方面也是為他們的理想而奮鬥。

與此相反的是，國民黨則積極與工商界靠攏。最近幾年，國民黨越來越重視那些大財團的利益；國民黨提名國泰關係企業集團的蔡萬才參選就是一例。它支持大財團，利用進出口配額及銀行貸款等歧視政策來剝削中小企業者。就是這種矛盾關係構成了黨外的反對基礎，並決定了黨外與國民黨截然不同的聯盟模式。黨外新一代的知識分子，在其他異議領袖的缺席下，本身也是出身中產階級的他們有必要負起領導責任，另一方面，他們也受到社會上被剝削部門、工人，以及部分政治意識覺醒的中產階級的支持。

國民黨方面，由於他們的統治方式僵硬嚴酷，意識形態食古不化，一些工業發展下重建新秩序的社會調節現象，如女權運動、年輕知識分子所推動的鄉土文學運動、及勞工運動等，都被逼在向一個角落裡，被迫站在一起，在民主與民族自決的呼聲下聯合起來。倘若在另一個歷史階段，上述那些力量不一定會聯合在一起。

一般來說，這批知識分子固然認識到政權的壓迫力量，並且決心面對這股力量，但他們的視野從未超越台灣海峽，也未超出西方式的民主理念之外；否則他們就看得菲律賓及其他一些美國庇護下的獨裁國家，即使統治者是當地人，情形還是和台灣很相似；由軍隊及秘密警察構成的統治基礎，須因應跨國資本的需求而形成的經濟不平等和不公的社會秩序，還有順從的買辦商人組成的共犯階層。溫和的改革者通常被當成革命分子而受到迫害，因為真正的民主制度會擾亂那種不正義的秩序。而對軍人及秘密警察而言，知識分子是危險的，因為後者可能會撕破統治必須合法性的假面真。

或許一種比喻可以說明這種現象。新一代知識分子想要逼迫國民黨敞開大門，並開始清查挖掘出大門內的一些醜事。譬如說，張俊宏揭發了新生戲院重建的賄賂內幕。但只有國民黨心裡有數，一旦大門被撞開，即使只裂開一條縫，到底還會有多少見不得人的醜事會一一曝光。在這些新知識分子的內心深處，不是沒有想到過情治勢力有一天可能會反撲；雖然他們明白，許多人差點進了刑求室和死刑場，但在心中的幽暗處，仍然沒有人願意面對這件事。

高雄事件發生後的那二天，我觀察到令我困惑的事。除了施明德默默地準備被抓外，其他人似乎還無法面對內心巨大的恐懼感，去正視立即來臨的威脅，和張在我們面前無所不在的搜捕網。我看到大家那時候在極端害怕下產生一種心理作用（逃避並否定即將被捕的可能性）。我注意到這種現象，因為我曾經訪問過政治犯及他們的家屬，他們也有過同樣的傾向。（或許也因為我被捕及被刑求的可能性較低，才比較容易觀察他人的表現。）簡單的說，那兩天大家共同的情緒似乎是迷惘；「為什麼他們要逮捕我們？我們都是善良的人，無意造成傷害，我們只想改革，這對國民黨也有好處。」姚嘉文在十二月十二日的國際電話中的談話更反映出這種情緒：「我翻遍六法全書，找不出我們犯了什麼罪。」

即使有這麼頃刻的怯懦表現，整體來說，新一代的台灣知識分子比以前的地方政客或權力搞客更有原則，也更有勇氣。至少在理論上，他們有勇氣面對鎮壓，正如一九七九年七月他們發表的聲明，「我們願意為台灣的民主前途坐牢。」那些此刻沒有被抓進牢裡的人，必定更加堅韌。

## 中美建交造成台灣人的恐懼感

台灣民主運動絕大部分的動力主要是來自於「匪」美即將建交所造成的急迫感。一九七八年，美國不斷暗示要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而終於在是年十二月十六日宣布建交。台灣這時面臨的險境是，一個令人厭惡的非台灣人新政權似乎正迅速的迫近。而這批中國人比目前統治台灣的外省人更蠻橫，勢力更大。各種跡象顯示，目前台灣的外省統治精英只顧自己，把他們的未來、身家安全全部寄託在美國。因而此時的民主運動帶有強烈的台灣民族主義色彩。施明德特別是這種民族主義的象徵，這種強烈而果決的民族主義乃是繼承著早期的傳統，並以台灣人的反抗基地——高雄為大本營；施明德真有個人主義色彩，但尚未受到精英式的機會主義污染。

但另一方面，台灣民族主義也有其保守的一面，因為台灣人的自決指的可能是「台獨」現狀的持續，也可能使得社會結構的現狀繼續下去。上述的台灣新知識分子原來也只是追求台灣人參政的權利，以及要以民主的方式決定台灣的前途。但是真正的民主應涵蓋社會及經濟全面的變革。這讓我們看到一個新的分析觀點，也提醒我們，一九七九年後期，

《美麗島》雜誌、影響力日增後，所帶來人格、結盟、及潛在群眾基礎等方面的新組成型態，最後也暗示新一波的政治運動的來臨。

台灣的中產和中上階級，就像別的地方成功的中產階級那樣，在追求公平分享政治權力的同時，也期望安定。在台灣，就像南韓和以前的南越一樣，法西斯政權慣用共產主義勢力坐大的幻覺，以及共產主義會強制實施經濟的平等化，以此來嚇唬中產階級，使他們不敢起而反抗，而只能坐視當權者扼殺民主。

當然，共產主義也許構成威脅；但戒嚴令的真正目的則是在滿足統治者貪婪的需要，因而經濟及政治的自由都被犧牲。不管人們是否真的被恐共宣傳所說服，他們明顯看得出來，國民黨有效地控制著政權、特務及軍隊，要取而代之，必須經過相當的社會混亂及武裝鬥爭。

更進一步說，不管他們使用的方法如何短視可笑，國民黨到底維持了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分離現況。台灣的資本家及中上階級固然不滿國民黨統治，但他們更怕中國、更怕不安定。這種態度通常叫著「革新保台」。他們私底下念念不忘台灣民族主義，實際上卻最容易與國民黨合作。他們希望逐漸地改革，不管步調如何緩慢，他們覺得跟國民黨合作有它的道理。他們會說：「我們當然希望在自己的土地上當家做主，但我們不能做出任何可遭致中共干涉的任何事。」這些人可看成是心態上和口頭上支持「台獨」，而實際上則是相當程度的「蔣獨」的忠實支持者。我們不能低估這一點。

持有這種心態的，還包括一些外省籍的官僚和中產階級，以及出生於台灣、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外省第二代。實際上，在年輕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當中，本省人和外省人已不易區分，因為那些受過教育的本省籍專業人士，已被政治上佔統治優勢的文化所同化。

這批外省人士已不想再回中國大陸定居，頂多只是想回去看看而已，如果他們有足夠的錢透過香港去安排此事，國民黨也不會加以阻止。他們亟求在台灣改變外在的政治形式，意在丟掉老一代那種偏執狂式的「光復大陸」意識型態，同時出清那座充斥著七八十歲老賊的可笑的立法院，以便追求長期的平衡控制。他們心目中的平衡控制當然須包留外省第二代在官僚體制內、新聞界、警界、軍隊以及國營企業裡的位子。

第二代外省籍中產階級人士的政治戰鬥能力差異性極大，境遇各不相同。有的如政治大學研究生因贊成「台灣獨立」，而在一九七八年中被捕；有的雖出身於救國團，卻變成進步的年輕社會工作者，並且成為康寧祥的競選助手；對部分安於逸樂的年輕人而言，台灣已經夠繁榮了，也沒什麼不好的，他們認為等到老一輩人漸漸凋萎後，自然會出現一些小改革。至於說到調查局刑求的事，這種人總是不情願地的回答說：「政治是骯髒的，我不願去談，也不想捲進去。」

## 中產階級的選擇：「革命保台」或「革新保台」？

國民黨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所點燃的引信，到了一九七八年尤其是七九年似乎快燒到引爆點。許多人認為國民黨最後時刻已經來臨，早已過了乞求國民黨關心台灣前途的時機。很多人猜測，一九七九年一月國民黨政府開放觀光護照的簽發，目的是使外省籍的達官顯要更容易撤退到美國。

台灣的報紙為了持有美國綠卡者是否能擔任政府公職之事，喧騰了一陣子。這事本來極易查證，因為美國政府規定，持有美國永久居留權的人每年至少需要在美国居住一個月以上，因此持有者的主管機關不可能不知道誰有綠卡。但這件事後來還是不了了之。

但從這件事可看出，甚至連本省的中產階級也到了被迫作決定的時候。即使台灣目前只有一些對宣稱要改革的國民黨政權絕望的知識分子，並未形成革命勢力，我們仍然可以把這種急於維護目前繁榮以及台灣領土完整的心態叫做「革命保台」，因為當前最嚴肅的任務就是「保住台灣」。

這裡我提出一個問題，這是在分析過程中尚未解決的問題，希望未來有人提出答案。這個問題就是：中上階級的台灣人，他們的最後立場是「革命保台」亦或是「革新保台」？後者基本上表示與統治者做消極的合作。換一個角度說，我們如何看出不同政治利益間的歧異？譬如，以大財閥與中小企業來說，前者似乎與外省精英有著較好的關係？我不能提供肯定的答案，但我從兩位黨外人士：康寧祥和許信良的不同路線中，看出它的意義。

在七〇年代中期，康寧祥是地方政壇中主要的反對派領袖，他在過渡期佔很重要的地位。他從北台灣傳統台灣文化重鎮——台北的艋舺地區阻起，而艋舺也是台灣南部流往北部非工業勞動力的集中地點。有謠言說，他的支持者之一是來自該地的黑道。他很像前面提到的地方山頭。可是，他超越地方山頭的活動範圍。他與新一代的台灣知識分子如張俊宏、姚嘉文等聯合起來，在一九七五年創辦了《台灣政論》。當時的康寧祥以空前的敢言著稱。

人家告訴我說，康寧祥本人並不認為《台灣政論》具有長期發展性，他只是想藉此在選舉前建立他的知名度。不管怎樣，《台灣政論》出了五期即被禁掉，它的副總編輯黃華被判十年徒刑。

可是到了一九七七年十一月，許信良當選桃園縣長，而新科省議員張俊宏和林義雄連手作戰使省議會會場充斥著辯論之聲，這使得康寧祥頓形失色。一九七八年末，我已看清康寧祥只是充當權力摘捐客的角色，但他做得很誠懇而有原則。他的捐客角色可從他處理一九七八年六月陳菊被捕、還有次年的余登發被捕事件看出來。毫無疑問，要不是因為一些比較不怕死的人開始全島串聯取代了康寧祥的地位，他本人是願意繼續擔任主要反對派領袖的。

康是怎樣的一名政治攝客？這個問題要從橋頭示威始末說起。在這裡先作簡單說明。

一九七八年七月和八月，國民黨政權利用似是而非的「旅行社」案來整蘇洪月嬌。在她的請求下，我幫忙把她的一些文件譯成英文，並且幫她向美國大使館及外國記者取得聯繫。那年八月中旬，我在慶祝陳菊脫離特務魔掌的聚會裡碰到康寧祥，出乎我意料的，他把我訓了一頓。

他質問我，為什麼我要替蘇洪月嬌做那些事？他說這時候他正與警備總部就那件事進行磋商，我的行為讓他覺得尷尬。我覺得心中一片疑惑，他為什麼要制止抗議行動？他應該為此事高興才對。他是不是在磋商制止抗議行動？康時常請我到他家吃中飯，並且開玩笑似的說，如果他是國民黨，他會立即把我遞解出境；他說我在採取行動之前，應先徵詢他的意見。現在我才比較明白，為什麼他要我事先和他商量。

康寧祥很關心他的立委一職是否能連任，即使他成為立法院唯一的反對派也在所不計，這是權力搞客的標準作法。一個人希望選舉贏，同時利用選舉喚起民眾的政治覺醒，這是很合理的想法。可是，在戒嚴及獨裁控制下，只關心自己的公職是否能保住，最後必將與民主運動的維繫發生衝突。

因此，康寧祥激烈反對黃天福和陳婉真在一九七八年出來競選，他覺得他們兩人出來會危及他當選的機會。他也責怪黃信介和許信良，因為黃天福和陳婉真是受到黃、許兩人的鼓勵而出馬參選的。

施明德和其他人的想法剛好相反，他們認為黨外的候選人越多，越真有戰鬥性，也會得到更多的選票，在黨外陣營中，為了擴大影響力，每個人必須冒一點險。

一九七八年十月及十一月，新的黨外聯盟結合成「黨外助選團」，此時，康寧祥與其他黨外的分離就更明顯。黃信介鼎力支持並且資助助選團，但康寧祥對黃天福很不滿，除了對他的競選有幫助的活動外，他杯葛黨外助選團的一切活動。由於此時聯合助選團對國民黨的挑戰日趨激烈，康寧祥為了表示自己對國民黨不具威脅性，他接納國民黨開明派參與競選組織。不久之後，我聽到他的許多助選員抱怨說，他們的文宣內容都被國民黨刪改。很多工作人員轉而支持陳婉真和陳鼓應的聯合競選。

國民黨曾以與黨外「溝通」之名召開一次會議，還透過報紙，宣布康寧祥和蘇南成會出席這次會議。約莫在選舉期間，國民黨政權的外交部向外國記者介紹康寧祥，說他是一位「模範」黨外。

到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匪」建交當天，康寧祥和黨外的鴻溝更為明顯。是日，蔣經國要求各候選人停止競選活動，康寧祥搶在黨外助選團之前，單獨發表聲明。那天早上，施明德在黨外助選辦公室得知康不擬加入共同聲明後，憤而摔掉電話，「為什麼康寧祥不敢與我們一起去坐牢？」臉上掛滿了淚珠。我從未見過施明德、那樣情緒激動。

選舉取消之後，黨外重行組合，余登發被捕，黨外聯合起來繼續抗爭。康寧祥卻警告說：國民黨準備大舉抓人。他似乎刻意與黨外保持距離以免被捕，只偶而短暫地出現在黨外活動的場合，目的是為了在表面上給民眾一個黨外團結的印象。

康寧祥說對了，所有黨外都被抓走了。康的確做了若干勇敢的姿態，企圖緩和國民黨的殘暴鎮壓，譬如，他在《亞洲人》第一期發表了一篇文章，為民主運動的領袖請命。現在國民黨已經把一些堅強的黨外人士清理乾淨，甚至於一些較無後盾的黨外「餘黨」如張春男和劉峰松（兩人於一九八〇年底參選，落選後被以違反「動員戲亂時期公職人員選罷法」之名起訴，罪名是「言論煽惑他人犯內亂罪」），也被輕鬆鏟除。難道民主運動領袖們的主要目標，只是在避免被逮捕？

康寧祥仍然是台灣反抗政治中的要角之一，最近的一次選舉他仍席捲了八萬票，高票當選。我們或許會好奇，支持他的選民是那些人？我聽說，他的選票中大都來自敦化北路一帶（該地區是台北最豪華的商業區和住宅區），而不是蝨紳。康不再是地方山頭，而是現代中產階級以及那些贊成「革新保台」者的代表。康寧祥的路線似乎代表著中產階級想要爭取更多發言權，但卻不願破壞體制的願望。為了維持這樣的地位，他的言論以及他所辦的刊物已經變得沒什麼色彩。《時報週刊》第一百七十二期（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五日出版）在討論到《八十年代》復刊的時候，也有類似的分析。

儘管如此，康寧祥至少仍然代表一股溫和反對警總統治的政治勢力。我從可靠人士得到消息說，王昇恨不得連康寧祥也一起抓走。這種在國民黨容忍的範圍內以半抵抗，公然蔑視政權的策略，是否是一種合理巧妙的反抗方式？這種小心翼翼的抗爭方式是否提供重要的群眾教育？但是，他充任「馴服」而「忠實」的反對者，變成國民黨裝點民主外表的裝潢，不就等於維護了這個政權的合法性？

從這個角度推論，康寧祥的路線不是在教育，或維持一種堅強的抵抗活動，而是與壓迫者合作，製造有利於壓迫者的幻覺，渲洩中產階級不滿情緒。國民黨標準戰略是，一



面宣稱改革及民主化正在醞釀之中，一面逮捕、刑求那些要求看到改革成果的人。我且引用蔣經國的話：「高雄事件並不會阻止我們朝著民主的方向進步。」但自從民主運動領袖被判刑之後，誰還會相信「漸進式」的方法？這方法除了使運動倒退之外，簡直走投無路。

如果我們只說，「原諒」康寧祥吧，不能期望每個人都要像張春男那樣堅強果敢（張春男只因說了：「我挺身出來競選，是要表示台灣人有勇氣，你不能把全部台灣人統統抓光！」這句話而被判刑三年半），而且每個人都可用各自的方式做出他的貢獻，但這是不成理由的。可是我們也不能光是責怪康寧祥，說他拒絕為民主運動奉獻他的生命。在社會分析裡，我們不能把康寧祥或任何其他他人當做個體孤立看待。我們問題的焦點是社會因果關係。支持「革新保台」的階級能夠推出成千上百的候選人。如果我們下決心說蔣政權應被推翻，而不應與之合作，那麼，這個階級的人是否應該受到支持、指責或忽略？

這是一項微妙的抉擇。革命者不必要疏遠改革者，但他們不能有依靠改革者的幻想。革命的覺悟也不能單靠訴之道德的方式。革命是一項冗長而靜默的發展過程，它利用改革者的行動計畫，但主要是靠的是社會力量。

比較一下康寧祥和許信良的不同，我認為，曾留學英國，主修政治學的許信良看到了勞動階級必須予以動員起來，以推動變革。他是一位高人一等的政客、民粹主義者，對選民的情緒有著敏銳判斷力，這樣說他，是批評中帶有讚揚的意味。他以共識及他的政治視野領導民主運動，但他不善於行政技巧。許信良從中壢事件以來的戰略，就是採取直接訴之於民的方式，而不是訴之警備總部或「立法機關」。他的行動也反映這個目標，最著名的是他推動黨外聯合助選圈，以及公開抗議余登發被逮捕。

我記得他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廿一日早上作分析說，如果我們不緊靠一起，國民黨會一個個把我們抓走。」許信良因參加抗議余登發被捕的遊行而被撤職後不久後，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在高雄扶輪公園參加美麗島的群眾大會。在大會上，他對於國民黨不顧人民選票所作出的選擇，而將他免職的事並沒有作憤怒的抨擊。他認為這是意料中的事。他很輕鬆地向群眾玩笑似的說，「當一個國民黨的縣長有什麼了不起？他們只不過叫你造橋鋪路，孝敬地方黨部而已。」這一句幽默諷刺的話，勝過千百句立場堅韌的形容詞句。

為了替一九七八年的選舉作鋪路工作，許信良敦促那些關懷社會的人士——王拓及陳鼓應出來競選，加入黨外聯合陣線，而暫且不考慮他們是主張的是「台灣」或「中國」的民族主義。後來，他及施明德不顧反對，堅持要把王、陳兩人及蘇慶黎納入美麗島組織。那時候，一批右傾坐過牢的政治犯在幕後散佈謠言說，「左統分子已滲透美麗島」，但這批人不敢站出來為他們的行動負責。

許信良的解釋是這樣，「左派分子有社會理論，我們有群眾，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以吸引群眾。」當然，與《夏潮》派維持合作關係還有更重要的理由，但必須從民族主義、社會發展以及反國民黨運動的範疇加以解釋。最後一點，從許信良挑選陳忠信做為美麗島的執行編輯，也可看出他對於政治及社會評論的銳利眼光。儘管美麗島有上述一些問題及侷限性，在被國民黨停刊前，它已朝著以人民為主的經濟問題及與勞工階級團結的方向前進，雖然腳步偶爾並不是如此堅定。

台灣政治發展在這裡出現一個新的階段，亦即，「革新保台」邏輯上必定有某一點會正面衝突到轉變了的「革命保台」觀。理由是，任何努力推翻國民黨的先量都必須依靠勞工階級，而不是搖擺不定的中產階級，並且必須允諾基本的社會變遷。一九七〇年末期，新一代的政治活躍分子的先驅者，比起前輩來，在理論上更激烈，行動更有準備，他們已經出現在政治舞台上。

## 台灣的社會變遷與思想潮流

一位台灣朋友曾對我說：「在台灣，每五年就換新的一代。」這話有點道理，台灣的社會變遷向來十分快速。出生於在戰後五〇年代高出生率時期的人，與戰前出生的一代，經驗有很大的不同。多數五〇年代左右出生的人，在六〇年代（尤其是以一九六九年為最高峰），都歷經過大量農村人力移往都市，也就是大量工人階級人口成為城鄉移民的現象。由於都市與農村的收入約為新台幣四千元比一千元，許多人被迫離開他們的家庭，與傳統的文化疏離。

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三年台灣工業化快速發展的結果，許多十來歲的童工受雇於輕工廠，從事瑣碎而重複性的工作，生產一些出口用的塑膠、金屬、電子零件和木製消費品。他們來到都市，除了尋找就業機會之外，他們也想受教育的機會，以便有朝一日晉身為中產階級。一九六八年開始，學童可以免試進入公立初中就讀，一些設有夜間部的私立中學，招收工廠工人當學生，並與工廠訂立正式的工作實習契約，這些建教合作的職業學校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

少年女工比男工較容易找到就業機會。男孩子通常是在家庭壓力下一步一步唸完中學，在家庭經濟情形許可的前提下，準備參加大學聯考。如果不走這一條路，他們只能從事體力工作，賺取學徒級的工資。他們受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找一份白領階級的工作，特別是在政府機構中，當工作穩定可靠、福利又好的公務員。

現代工業化社會的意識型態，似乎把擁有資本的人所獲得的利潤合理化。它說，「如果你聰明並辛勤工作，你就可以賺大錢。」這種理念引起大家晉身上層社會的期望，以及你爭我奪地想往上爬的社會流動。

有一部分出身於農村及中低階級家庭子弟，順利進入了專科或大學，從事穩定的技術性及商業性工作，少部分人爬到了社會階梯的最高階層。可是這種從赤貧到巨富的現象，畢竟是少數，只限於那些在六〇年代台灣的出口成長期已能獨當一面的一代。絕大多數的人，即使受完中學教育，但在服完兵役之後，只能在工廠裡從事技術性或半技術性的工作。做了五年左右，他們就常常面臨被迫辭職的威脅，因為老板總希望以較低的薪資雇用新進的工人。

教育普及化之後，藍領和白領雇員之間的薪水差距越來越小，當然，前者的工作環境危險性高而不舒適，也沒有升遷的希望。就業市場後來無法再吸收大學畢業生，可是私立院校還不斷地擴充，申請入學的人更多。一九七八年及七九年間我們會偶然碰到大學畢業生開計程車。「這只是短暫的」，他們抱著這種希望。

在同一時期，一個耽溺於消費物品的中產階級已經形成。他們自有住宅，內部裝潢華麗，而且佔據著市區最好的地段，習慣在餐館擺潤而不在家裡宴客。台灣新出現的暴發戶，沒有鑑賞眼光，卻恣意於華而不實的消費。咖啡館、餐廳內部裝著稜形吊燈，繪成愛神邱比特的燙金飾品舉目可見。新的住宅計畫似乎專為有錢人規劃的，侵佔了陽明山附近雙溪和烏來良好的農田。台北盆地的有錢人，不但獨佔市區房地產和商業利益，而且獨享新鮮的空氣和綠色的風景。

勞工階級與富人的生活方式恰成尖銳的對比。工人們工作超時——大約每週六十小時，沒有時間與家人相處，為的只是多掙點工資養活一家人。勞保只給勞工次等待過。年輕工人手被機器碾斷是常有的事，而且發生的頻率高得驚人，但他們所能領得的賠償金，往往不到一個月的工資。

這一代的勞動工人大部分都侷促地生活在工業區附近的郊區住宅裏，他們所住的四層樓公寓，像都市發展的癌一樣，往稻田所填成的平地延伸。除了吵雜而危險的馬路之外，他們的小孩無處可玩。他們與親戚朋友自成一箇聯繫網，可是因為遷動頻繁，與長期以來鄰居殊少接觸，就像一些住在公寓的美國人一樣，難以在地緣基礎上形成休戚與共的社區，更談不上以社區為基礎的政治行動。

同時，消費者所碰到的一些廣泛的問題如空氣污染、環境惡化、食品污染、勞工保險、工業危害、以及受害者的補償等諸問題，已遍及全島。

此時，五〇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已達到了參與社會就業與適婚年齡。由此，選民的年齡結構改變，平均年齡降低。民主運動領袖的崛起一部分得力這批年輕選民的支持（到底支持的比例及幅度有多大，我沒有確切的資料）。新生代的教育程度相當高，溫文有禮。透過學校的教育訓練，他們相信國民黨懷著一股民主的使命統治人民：只有透過老一輩畏懼而守口如瓶的模糊說法中，他們才得以聽說二二八大屠殺以及白色恐怖的情況；所以，當他們知道國民黨選舉舞弊、特務任意屠殺等事情後，他們的反應是驚愕和憤怒。當工人們體驗到外資工廠的制度化，而由本地經理及情治單位嚴密控制的「工會」、危險的工作環境，以及表面上有政府檢查，實際上卻仍黑煙裊裊的煙函，他們的心理已種下了反對統治者的火種。

到了一九七七年左右，進口或在台灣製造的美國牌消費品充斥台灣市場，舉凡RCA電視、福特汽車、綠野香波洗髮精、美好挺襯衫以及舒潔衛生紙，甚至與台灣傳統文化習慣格格不入的體香劑和嬌生衛生棉條等，都以空前的數量出現在台灣市場。到了一九七八年及七九年，連小店冰箱裡到處都可以看到加州和弗羅里達橘子製成的昂貴的果汁。

台灣本地盛產橘子，果園農業是少數能夠賺錢的農業之一，但是，為了收買美國，不讓美國因接近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遺棄「中華民國」，國民黨像一名年老色衰的妓女那樣，自動降低身價以留住顧客，以高於國際價格的價錢，向美國買進大量的剩餘商品。同時，國民黨還將外商每年的投資盈餘，從百分之十五提高到百分之廿。可以預料的是國民黨會加速出賣全台灣的工人及消費者的利益。

## 社會主義色彩的台灣民族主義之形成

新生代的異議知識分子此時領導出現了一個新的質素。這項新質素的潛力和特質突然因《美麗島：台灣民主運動雜誌》的出現而明朗化，同時開始扮演重要角色。這一全新的、或者說是再生的質素，就是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台灣民族主義。

我說帶有馬克思主義色彩的台灣民族主義是台灣政治運動一項新的發展層面，並不是單憑我的主觀印象。一九七八年十月底，警備總部所屬的仁愛莊（警總設於土城的政治犯管訓中心，讓思想犯在出獄前一年重新適應社會）的負責人會「邀請」施明德舊地重遊。施明德十五年的牢獄生涯的最後一年，正是在仁愛莊渡過。

那天，我和施明德以及兩位美國記者一起前去仁愛莊。幾位管理人員把施明德帶到另外一間辦公室，他們非常「關心」施明德，說他如果繼續被政治、污染，特別是出任黨外助選團總幹事，有一天會被送回到仁愛莊來。另一位官員則引導我和那兩位新聞記者參觀這座富有詩意的囚犯營。營裡面草坪如茵，用人工修剪得很整齊，令人印象深刻的職業訓練工廠裡面，工具陳設整齊，只是工具上面都鋪著一層灰塵。

我尖銳地質問我們的嚮導一些問題。他似乎自己覺得很仁慈，他說，「我們不把這裡面的人稱做『囚犯』，我們稱他們為『學生』。他們每天要讀八小時的歷史和國父思想，我們以愛心對待他們。他們都已被改造成愛護我們的政府良民。這裡面的人，有的是台獨分子，有的是親中共的共黨分子，最近幾年來，則左傾的台獨分子越來越多。」我相信，至少單憑印象來說，他的職務會讓他對這種趨勢相當敏感。

反對派政治思潮的改變即使不普遍，也漸漸明顯，為什麼會有如此改變？我相信最基本的理由是前面所敘述的台灣社會變遷。而在表面上，我們還是可以從知識分子思潮的改變，以及國外事件對台灣的衝擊看出來。

台灣的對外關係以及國民黨控制下的傳播工具，都把美國和日本當做注意的焦點，因為這兩國是國民黨政權賴以生存的本錢。具體來說，一九七〇年到七一年的釣魚台運動，不但刺激了一大批台灣留學生的思想，也重整了他們對台灣的看法。當時，中共正為文化大革命而沾沾自喜，想藉以造就一批「新共產黨人」。同時，美國校園裡也受到反帝及反越戰激流的衝盪。美國的反越戰運動興起，一個嶄新的中國出現在世界舞台，它恢復了聯合國席位，接受尼克森總統的訪問，受著這幾個事件交互衝激，台灣留學生（不僅只有外省籍學生）爭相加入釣魚台運動，也就不足為奇。這股民族主義、反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潮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在台灣的知識界裡掀起一陣漣漪，當時的《夏潮》雜誌就是顯著的例子。

當這股思潮衝擊到台灣本島時，有二個因素改變了波浪的方向。首先，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指示「走向群眾」，使得運動的「台灣化」不可避免。即使毛澤東思想受國民黨宣傳所扭曲，通常，出身於貧窮農村及中下階層的大學生，還是最容易為毛澤東思想所吸引。有一位學生就說，「我們何必浪費時間去辯論四人幫？我們的任務是剷除台灣的法西斯政權和美國帝國主義。」

諷刺的是，三〇年代台灣的工農運動史以及台灣文化的根源的研究。卻是由懷抱大中國民族主義的「夏潮」派帶頭開始的。在所謂的中國民族主義者當中，有一批坐在搖椅的左派及中華沙文主義者，他們不相信台灣人能夠掙脫帝國主義的桎梏，心安理得地等待中國的協助。因此，他們在台灣的民主運動中逐漸落伍脫隊。另外一批人，譬如陳鼓應和王拓，則積極參與民主運動，為爭取民主及言論自由而奮鬥，從而變成群眾運動的一分子。

其次，四人幫倒台後，抖出很多文化大革命期間犯下的暴行，再加上當時那篇高高在上的〈告台灣同胞書〉，已經使中華民族主義大為減色。再者，中共喊話的對象一直都是國民黨，而非台灣的人民。如果國民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地位，中共會不會照它對國民黨所作的承諾，保持國民黨政府、經濟及特務系統的完整？或者，中共政府會不會支持台灣人民的鬥爭？後者的可能性似乎不大，看來中共目前的政策只會疏遠那些遭國民黨特務迫害的人。

另一股社會主義思潮也在教會圈子裡激盪起來。過去十年，中南美洲國家的教會，為了應付蓬勃的革命運動的挑戰，重新整合宗教的思路，亦即主張在現今世界的社會環境下的道德行動哲學——解放神學。台灣教會的思潮也反應著這股潮流，長老教會及天主教Maryknoll的年輕傳教士都深深受到解放神學的衝擊。上述這二個教派與本地台灣人有著長久密切的接觸。長老教會在台灣已有一百年的歷史，他們的台灣民族主義的立場明確而不含糊。他們很早就呼籲蔣政權宣布台灣獨立。長老教會有堅強的社區基礎，透過它的社會服務，可激發年輕教士的社會良知。

## 新生代社會主義分子

上述幾種社會思潮並不是自我產生，工業化引起社會關係的改變是上述思潮的基底成因。新生代的各種思潮反映了社會結構變動的情勢，並將之串聯，但所產生的效果比以前任一種意識型態更具影響力，並擴散至社會的每個角落；不但擁護西方自由民主的青年人們深受震動，甚至連國民黨控制的救國團也受到衝激。

我聽過一些輔仁大學社會系的學生這麼說：「我們每天都看到學校附近新莊工廠工人上工的情形。他們年紀和我們一樣大，但他們比我們苦多了，還得忍受極差的工作環境。每個人都知道我們的經濟靠出口工業。那些工人就是出口產品的主要製造者。我們大學生雖然養尊處優，其實我們是社會的寄生蟲，我們盼望能瞭解他們並跟他們打成一片。」

其賞，年輕的工人也有類似的意見：「我們工人才是台灣經濟的真正的棟樑。可是大學生受到尊崇，我們反而是被藐視的一群，我們應得到更好的待遇才對！」

新生代的社會關懷，和大他們十歲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比較起來，並沒有較深的理論分析的基礎。但是這種全面性的社會變遷，卻是這批年輕的台灣社會主義分子有可能取得領導地位的社會基礎。在新生代政治活躍分子中，有社會主義傾向的人在人數上比那些模仿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者少，可是他們在民主運動上的重要性，超過人數上的比例。當中產階級思想領導者與國民黨正面交鋒並釀成群眾運動時，這些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新生代不畏顯而易見的危險性，仍大舉投入。

新生代的自由主義者，只要有優雅的寫作環境，例如，參加康寧祥的《八十年代》編輯部，即能滿足。在從事政治活動時，我們常常碰到染上所謂「聰明大學生症候群」的一種人，他們年紀輕，菁英心態極強，特別擅長擺出自由主義的架勢，偶而發表一套反政府的犬儒主義論調。他們會儘可能瞭解黨外活動，以表示他們「很通」，有時候會拿筆來，寫一二篇文章，可是他們很鄙視日常例行性的工作。這種人對群眾運動極少用處。不過還是有像林正杰一類的新生代自由主義者，他們對黨外運動的貢獻仍不容忽視。

跟這些人相處了一陣子，我逐漸學會，在花幾個小時向這群新生代自由主義者解釋事情之前，先要求他們幫忙處理一些小事情，以考驗他們參與的誠意。

許信良和施明德開始培養和吸收那批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年輕人進入「美麗島」，因為許施兩人看出，這批左派傾向的年輕人願意為行動獻身，他們本身具有成熟的社會理論，同時又能投身群眾運動。雖然許施兩人並不太管社會理論，也不太能掌握不同社會理論的意涵。若有同樣的效果，他們也一樣會重用新生代自由主義者。

大部分黨外新生代活躍分子的民族主義立場都還不清楚。但我認為，在當時的情勢下，民族主義就隱含在對國民黨的抗議行動中。老一代的人很清楚的分成「台灣獨立」和「統一」兩個陣營，然而新生代似乎只擷取他們的文化傳統。這項傳統一部分來自四十年代流亡至台灣的移民，另一部分則是台灣原有的文化，但他們剔除了兩種文化傳統中精英成分較濃的部分。老一代所形成的「台獨」和「統一」與新生代的政治行動毫無關係。就前者來說，台灣已經是一個實際上的政治實體，脫離中國而存在已近八十年；就後者來說，對那些擁有中國民族主義思想的人，中共並未對其表示支持之意。一些等待「老大哥」跨過海峽來解放的人，或者一些只想在國民黨內追求改革的人，找不出理由為眼前的民主運動犧牲。在民主運動的脈絡下，積極的參與是衡量認同台灣的關鍵性標準——而這也是台灣民族主義的起點。

在《美麗島》雜誌的組織裡面，這批「年輕台灣社會主義分子」扮演什麼角色？他們人數上雖不多，卻是編輯部的主力，尤以執行編輯陳忠信為代表。由於他主持編輯部，我們才看到《美麗島》清楚、堅定而自信的社論，不逃避，也不乞求改革。由於他的編輯政策，每一期的《美麗島》都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分析具體的經濟問題，暴露國民黨政權買辦的本色以及經濟帝國主義的特質。《美麗島》雜誌討論問題已超出自由派領導者的水準，它是自由派中產階級領導者在集權政權的壓力下，尋求小資產階級和勞工與農民階級為基礎的群眾運動的領導先鋒隊。

### 代溝：25 歲的「新生代」vs. 40 歲的「新知識分子」

可是，在一批被新生代視為是墨守成規、威權主義、社會視野狹隘的美麗島中央的領導下，這批反帝的青年顯得極為不耐煩。

在蘇慶黎協調下，從一九七九年十月起，《美麗島》、《春風》、《八十年代》的實際編輯人員，每月定期舉行聯合會議，儼然形成另一個「新生代」活躍分子的溝通及指揮中心。這時的新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和社會主義傾向的新生代，兩代之間的思考方式的不同，不斷地在數不清的小事情中顯露出來。

一九七九年十月，由於「美麗島」已日漸穩固，並表現出抵抗國民黨的能力，隨即成為一般民眾請願的對象，有些請求是政治性的，有些是非政治性的。

台灣在國民黨封建統治之下，向政府請願仍像清朝時代向縣太爺求情一樣。有時我恍然覺得相當多的民眾把我們黨外視為台灣這塊土地上真正公平的縣官，而國民黨官員則像一群臨時代班的貪官污吏。他們向黨外陳請，要求救濟，就像他們向一位負責的官員求情那樣，但黨外對於大部分請願案都無能為力。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一位女士向黨外抱怨她的土地所有權受到不公平的裁決，因為訴訟的另一方向法官行賄。但是這位女士對「美麗島」的職員也擺出一付要賄賂的態勢。如果有人肯聽她訴說她的遭遇，她就願意請吃幾頓大餐。另一個案例中，一位新科村長指出，當地的國民黨黨工威脅他。一群在某地領有汽車貨運裝卸工會執照的工人，因為一家建設公司在該地蓋房子，而被剝奪了受僱的機會。當地警察似乎拿了該公司的好處，不斷的拘押出現在工地的工人，並拘留他們一到二天。這些工人沒受過教育，不會說國語，他們很憤怒，因為報紙在報導這件事的時候，把他們描繪成一群無端惹事生非的流氓無賴。

從社會行動和動員基層民眾的角度來看，上述這個案例饒富意義。這牽涉到二三十名原告。很清楚地，這是一宗商人勾結政府官員剝奪工人權益的案件，《美麗島》雜誌如果披露此事，可能會極有影響。

我凝聽工人們申訴這宗案件，預想編輯部會派出幾位年輕工作者，繼續追蹤此事，寫成一篇文章。但當時在場的主管，卻漫不經心的把這宗案件轉給主拓，好像他是專門負責工人陳情似的。我質疑此事會有任何結果，因為看來替工人爭取權利不是「美麗島」工作的優先項目。

後來，屏東養豬案件發生，「美麗島」卻全力處理。由此可見，「美麗島」這批新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只對於人數牽扯比較多的案件才感興趣，因為他們就像一般民主國家的政黨一樣，目的在於爭取選票，而不是像左派那樣，意在了解社會力，以及民眾白發動員的可能性。

《美麗島》雜誌組織裡面新生代之一的蔡有全，畢業於台南神學院。他和其他一些「解放神學」青年全力推動成立進步的教育及文化計畫，但都未被採納。蔡有全是施明德在「美麗島」的助手，負責雜誌發行工作。他抱怨說，他有能力設計一些關懷勞苦大眾的社會方案，但現在每天卻被文書工作所困，不時還得受到緹緝必較的黃天福在帳面細節上的節制。

他堅持，他所受的傳教士訓練，目的在替台灣人民服務。他離開傳教士的崗位來到「美麗島」，是為了接觸更深一層的政治社會問題，結果，他在「美麗島」變成一名小商人。蔡有全要求「美麗島」內部培養出真正的平等和同志愛，結果剛好相反。那時候大家都知道，「美麗島」辦公室的電話都有特務錄音縮聽，但黃信介居然兩度在電話中罵蔡有全是「共產黨」。蔡有全非常失望，曾數度要求辭職。

我和蘇慶黎曾多次勸他要有耐心，民主運動對於將來發展很重要。群眾運動藉選舉活動來發展，在過程中產生許多「政治明星」，以及帶有中產階級自由派的立場，應是預料中的事。就我現在從馬克斯主義的角度來看，我們只能盼望，在動員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之前，有一個民族主義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連動。一個馬克斯主義者應對自前的政治發展保持耐心，如果盼望自由主義運動發揮其他的功用，可能犯了「左傾幼稚病」。

可是，蔡有全和其他解放神學的追隨者，在很多方面仍保有浪漫的情懷，有時竟和自由派一樣天真，希望民主運動在對抗獨裁政權能有一連串的突破。蔡有全那種年輕人勇往直前的勇氣，令人激賞。

一九七九年那幾個月，「美麗島」幾乎成為一個奇蹟，儘管幾度傳出抓人的危機，以及過度膨脹的成長所引起的內部問題，但每週都有許多新的組織與成員加入。那年十一月，我們似乎都以為政治恐怖已成往事，「黑暗時期」已成為過去。我們沒有深刻的政治分析，也沒有別的國家的政治經驗可資參考，竟未能查覺即將來臨的全面鎮壓，更無法推測國民黨為了撲滅民主運動，準備付出多大代價。

這並不是說，所有左派青年都很天真，也不是說，那些參加公開鬥爭的人犯了錯誤，因為公開鬥爭是發展群眾政治覺悟的必要工具。我相信，還有一大群更激烈精明的左派青年，他們看得較遠，獻身更徹底。這類人通常都避免涉入民主運動，以免暴露身分。他們也避免與黨外人士接觸，因後者常處於特務的嚴密監視之下。

有一件小事情更可以充分顯示出《美麗島》雜誌編輯部裡面，社會主義傾向的「新生代」和老一代之間的磨擦。第四期《美麗島》比出刊日期（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五日）晚了幾天才送印刷廠付印。負責設計版面的美工藝術家，分別以紅、綠、黃三種顏色做為前三期封面的顏色。第四期的封面他設計的是黑底加上鮮紅及藍色的字體，據他說，這是參考美國〈時代雜誌〉設計的。因為印刷廠就在黃信介住宅附近，他路過印刷廠，看到第四期的封面設計，立刻阻止不叫付印。他認為該期的黑色封面不吉利，尤其是第四期的「四」，與台灣話的「死」諧音相近，他馬上下令把顏色改成藍色。張俊宏也同意黃信介的看法。

整個《美麗島》編輯部為之諱然，譏論這種作法是迷信，特別是身為現代政治運動領導人居然還怕這種迷信。他們抗議說：「編輯部並不平擾你們的群眾活動：你們也沒有權利干涉我們編輯部的決策。」那位美工設計並立刻辭職，表示抗議。這種小事情之所以鬥得那麼激烈，從深一層看，反映出長時間以來新生代的不滿；他們並未獲得任何權利得以塑造血且織內的各項政治政策。

儘管發生了這個撤換封面的風波，並未影響第四期的銷售量，在美麗島事件的前夕，該期共賣出了十一萬以上。不過第四期也成為絕響。

高雄人權日遊行的標語和歌曲都是一批解放神學青年的傑作。他們首次獲得授權以他們平常直接和勇敢的方式，表達了他們對被壓迫者的關切。這些標語牌寫著：「還我言論自由」、「人人經濟平等」、「停止剝削農民」、「反對壓榨勞力」等。他們唱的是帶有宗教色彩戰鬥意味的進行曲：「民主，我們要爭取；人權，我們要堅持」，調子是模仿美國愛國愛神歌曲「Glory Glory 哈利路亞」。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九日，他們在鼓山警察局派出所前靜坐示威，顯示他們對國民黨權威的強烈蔑視，以及對於人民力量的信心。

我不相信這些標語口號招來國民黨全面鎮壓，它們也不是引起群眾與警察衝突的理由。我確信，國民黨的治安單位在事件發生一週前，已做好全面準備。但這些標語可能鼓舞了參加高雄人權日紀念會群眾的反抗情緒。

我們可預期，台灣民族主義的浪潮和社會關懷只有日漸膨脹的趨勢而不是降低。首先，工業化的一些後遺症，例如對環境的破壞、極端依賴出口經濟所帶來的就業不穩定、以及能源油價不斷上漲，在可見的將來都解決不了。新生代會繼續增長成熟，推動他們對整個社會的平等關切。

其次，台灣民族主義會越來越明朗化，因為在現行體制下，改革主義無疑已受到決定性打擊。即使沒有直接喊出來，但對現有體制的反抗就隱含有台灣民族主義。國民黨政權是為那些有綠卡的人、官僚和經濟買辦服務。國民黨的舉措只強調解決每期的正統危機。那些住在台灣而沒有逃亡餘地的人，包括台灣人和外省人，對於台灣長期的命運有共同的利益，也沒興趣與中國統一。從馬克斯主義的角度來看，民族主義是歷史和當下的客觀環境塑造而成。

台灣的未來操之於青年之手。但在下節我將敘述《美麗島——台灣民主運動雜誌》的主要組成，亦即前面幾節提到的幾種類型，以及他們在美麗島裡面所扮演的角色。

### 〈美麗島〉雜誌領導人的觀念與策略

本文描寫了數個不同「世代」以對抗國民黨獨裁的政權為職志的黨外領袖，或許我們可以把這些領袖看成是台灣當代史上不同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產物。雖然他們成長於不同的階段，（也可以說是不同的經濟區域，如都市與小鎮商業之對比），在年齡上平均也有七至十歲的差距，但無論如何，這些不是區分他們最重要的標準。反而，他們的意識型態和政治行為模式才是較重要的區分標準。也因此，我並沒有因為年齡的關係，把「新生代」中的自由派和意識型態相近，年紀卻比他們長一輩的新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分成兩類。

在上面的文章中，我把公開活動的黨外代表分成四種類型：(1)傳統士紳，(2)地方政客，小資產階級及農民支持，以及在台灣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近似地方派系的中產階級權力捐客，(3)新中產階級知識分子，(4)社會主義新生代。在民族主義的問題上，這幾個世代間顯現出些許的差異。一九四七年離開台灣、逃亡至日本並籌組「台灣臨時政府」的老仕紳明確支持台灣獨立；但留在台灣的老前輩如黃順興、余登發及楊達（平均年齡在六十歲上下），則對一九三〇年代中國革命理想心嚮往之，至今仍猶懷抱著大中國的民族主義。相對地，幾乎所有成長於後二二八時期的本土政客以及土生土長的自由主義新知識分子（年齡在三十到五十歲之間），不論是直截了當或態度穩晦，他們都在尋求建立「台灣共和國」的途徑。這一世代的例外則出現在社會科學領域中一小部分的知識分子



（包括社會學和哲學領域，不包括政治學），他們受到「釣魚台運動」（前文中已提及）的影響，開始有社會主義傾向，並對中共心存嚮往。而身處一九七〇年代末期的年輕人（二十～三十歲之間），在成長的過程中早已將中華民國或台灣的政治結構視為當然，對二二八和白色恐怖也幾無所知，因而對新生代而言，他們可以較不帶強烈情緒地面對統～獨問題。或許如雷震等較早期的自由派外省人士也應該列入這裡的歷史描述中，不過，我尚未看出他們的行動在台灣社會有深厚的根基，所以在此我沒有把他們概括進來討論的企圖。另有一種黨外的類型，諸如純民族主義革命者（施明德是例外，稍後將有專文詳述），但由於他們在公開活動中不以團體或組織型態出現，所以我也無法依據我的經驗把他們歸入某一類。以上這個分類法對瞭解台灣當代民主運動和預測其未來發展而言，或許是個重要的工具。

對於民主運動較熱烈參與的，則分屬三個類型：頑強的地方政客、新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和社會主義傾向的台灣民族主義新生代。其中新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尤其是組織和政治躍進的先鋒。

一九七九年的此時，反對運動陣營和社會上都出現了一種我們稱之為「改革主義」的想法。這種想法他們還未形成一套革命的意識型態，但這並不表示黨外領袖完全沒有革命的準備；一旦未來走上革命之途，我相信他們不會退縮。然而至少到目前為止，逼迫體制內改革的非暴力抗爭尚未走到底。

民主運動所以能成長，是因為人們希望充分利用國民黨體制下的選舉和立法的改革，民主運動的領導者似乎對民主程序實現理想的可能具有充分信心，並認為可能藉之達成政治結構的變遷。

在另一方面，黨外的領導者完全瞭解國民黨不遵守它自己的法律，他們知道即將面對巨大的危險，於是尋求運用人民的憤懣來強迫國民黨遵照法律及民主程序辦事。他們相信可以是一種漸進的過程，但他們不被动地等國民黨自己實行民主，他們要挑戰國民黨的侷限。

不過民主運動的領導者缺乏的是一套一致的革命理論。他們不深究社會如何產生功能，又如何改變。就某種程度而言，這是「美麗島」組織前進的障礙，這些障礙包括：(1)他們並未建立一個互相依存、目標一致的有機體，結果淪為只為反國民黨的團結；(2)未能吸收二級幹部以打破組織動員的瓶頸；(3)他們並未針對國民黨鎮壓，策訂一套堅定而合適的策略與紀律。由於沒有這樣一套意識型態或改變社會的方法模式，也就沒有「領導中心一致」以外的團體行動基礎。他們知道搖筆桿，但不懂得用劍，施明德也許是例外。

這也是我對當時黨外領導中心的印象。他們相信只要爭取到言論自由和成立反對黨，國民黨就會分裂、孤立，並同時失去對社會的控制，甚至垮台。施明德一九八〇三月在大審時的說辭反映了這一點。他說：(1)「美麗島」是「一個沒有黨名的黨」，(2)透過民主過程，人民可以「合法推翻」一個政府。他們正是在尋求憲政的、非暴力的方法，以推翻國民黨。

抱持著這種政治改革的觀念，以及他們對於自由民主的基本意識型態，領導中心會把言論自由、成立政黨視為最重要的工作是不難想像的；他們希望藉此暴露國民黨的本質，並形成一般民主國家的政黨規模，從而藉以取得立法權，這些都和「美麗島」的結構和活動一致。施明德多次提到他的反抗策略；「美麗島」領導者一定要堅持發言說話，即使讓警察機關槍和坦克團團包圍，也不能緘默。這樣的對抗，將使群眾和警察漸漸適應和習慣，也可以逐漸消除雙方的恐懼。就某種程度而言，這也是我們在一九七九年十月及十

一月的經驗。帶著半嘲弄、半討價還價的挑釁態度來處理與警察的對抗是可能的，但和特務就不一樣了，因為特務有其整體的行動計畫（如同我們在美麗島南投分部成立時的經驗）。施明德相信治安單位將會避免衝突，「容忍」的限制將會因此而逐漸地延伸擴大。

## 《美麗島》雜誌的結構

在設計「美麗島」組織上，施明德佔有重要地位，他經常在構想、組織的計費和章程，小心翼翼地在全島生的「美麗島」組織間，為黨外的各種參與者設想合適的角色。

「美麗島」組織是黨外助選團的進一步發展。就我記憶所及，其黨外組織架構圖大略如下：

### 「斗黨夕+候選瓦時誼吾」

黨外候選人聯誼會的功能，是在協調設在黨外總部下的平行組織，並不特別附屬於總部。它成立於一九七九年六月，創始人是呂秀蓮、張春男和其他南部候選人，這些人覺得他們遠離權力核心，他們希望有向己的影響力和勢力圈子。

一九七九年三月，「政府」尚未重新開放雜誌登記，當時黃信介已考慮申請發行人執照。這個組織遂一步步朝正式化邁進。當施明德四月起開始找辦公室承租時，我有點難以置信，他只在仁愛路、濟南路一帶尋找豪華氣派的辦公室，當時月租達一萬八以上，外加六萬元租屋保證金。結果施說服黃信介出錢辦雜誌、租辦公室，此事顯示施確有發展政治組織較遠的眼光，他是正確的。

第一件顯著的事情應是黨外總部的形成，做為一個黨外中心組織，坐落於仁愛路的辦公室在當時和國民黨的中央黨部形成對比效果，對黨外總部也有很多便利指揮的地方，包括內部財政、向總部分租的「美麗島」雜誌及其書報社。

第二，組織全島性接觸網，這是由基礎穩固的地方黨外候選人組成的競選結構，他們猶如一個商業組織聯合在一起。整體來說，這個組織乃由中小企業家和小鎮的小資產階級以及傳統的自僱勞工擔任後援，至於大型的本土和外資工廠的工人反而比較少。美麗島書報社的分社，大抵由候選人及其助選員建立起來。在都市裡頭的黨外服務處往往是租來的，並特別裝潢過，例如台中的三層樓建築，還有漂亮的書櫃；但在偏遠地區，設備方面就沒那麼派頭。舉例言之，屏東服務處開幕時，邱茂男在他屏東大街上米店的邊牆上、搭了三排架子（米袋與辦公桌只隔十呎寬），並加了一張辦公桌子，就權充一個分處。儘管如此，在開幕當天，店門口依然有三百副花圈沿街擺著，達四個街道長。

雜誌分銷的利潤由施明德統籌分配，只做政治目的之用，而不納入私人利潤，各地分銷處也一樣。《美麗島》和《八十年代》不一樣，後者是康寧祥的私人企業，很賺錢，但編輯人員卻每月只領薪四千五，勉強稱得上最低生活所需的一半。而「美麗島」雜誌則期許自己是一個政黨，如許信良所界定的，它是一個還沒有黨名的黨，一部分目的也是為了提供年輕黨外運動者的最低生活所需，他們的薪資約在一萬元之譜。

各地區分銷處（即各地服務處）負責推銷書報，不經過批發商以維持高利潤，並與民眾和零售商接觸。結果，成為「美麗島」雜誌成員演變為一件有派頭的事情。在都市中心，雜諧、銷售的利潤相當高，此點常引起紛爭，致使黨外總部不得不出面處理地方人事和利潤的問題。到第三期，總利潤已經達到新台幣一百萬元，這是一筆可觀的基金，而且大部份交易是現金。

各區域分支服務處由各區分社基金會配合，惟由台北基金會總部督導統籌，並由姚嘉文擔任主委。基金會總部是黨外的領導核心，握有黨外總部的核心控制力量。在地方上具有反抗國民黨經驗的頭人和有聲望的人物，也被吸收為地方基金會的成員。這多半是榮譽職，某些人也以個人經濟力量支持基金會。地方基金會的會員多在五、六十歲上下，在政治立場上不及年輕的活躍分子堅定，也不夠謹慎。儘管各地服務處應由「美麗島」指定的分社長或專職的新生代活躍分子者統籌，不過由於前者多半是地方候選人，他們不但有自己的生意，然而某些時候這些年輕的運動者會被視為助理式的秘書（尤其是女孩子），這些基金會會員有時就會和黨外總部命令唱反調。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七、十八兩日就發生一個案例，當「美麗島」雜誌被特務人員以侮辱南韓大使館為理由，受到嚴重的威脅，總部動員各地服務處張貼了大型抗議海報。可是在台中，因為地方警察的壓力，這些海報很快就被基金會人員撕下來。

編輯委員會的權力核心，是張俊宏、林義雄、許信良、姚嘉文、施明德等五人組成的小組，因為編輯部成員異質性頗高，也因為他們必須常處理個人事業和計畫，他們無法奉獻全部的精神時間給雜誌社本身，於是實際控制權落在五人小組上，而以姚、施為實際執行者。此外，實際政策決定的主要投入者應是編輯部，他們決策諸如設置全島性服務處之類的事務；不過，它沒有權力指揮實際的雜誌編務，編務完全由陳忠信、魏廷朝及其助理負責，五人小組完全授權給他們。執行編輯們曾把「副社長」呂秀蓮的稿刪去一大半，呂秀蓮很火大卻又無可奈何。由此可見新生代前進知識分子至少在編務上握有大權。

編輯部包括民主運動的主要參與者，諸如呂秀蓮、吳哲朗、陳菊、陳博文、黃煌雄、楊青矗、謝秀雄、蘇慶黎和王拓等人，結合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社會主義傾向知識分子，同時代表反對國民黨的台灣民族主義者和中國民族主義陣營，後者如「夏潮」的蘇慶黎、王拓。黃天福和謝三升則屬於意識型態色彩較淡的地方政客，代表黃信介的保守勢力。呂秀蓮和張春男更進一步推動候選人聯誼會，聯誼會則是各路人馬的會合，有地方政客如周平德和較不顯著的新知識分子如何文振。

「美麗島」的社員大約九十人，屬於榮譽制，是一個囊括所有反戒嚴法人士的聯合陣線。很多地方政客對組織並未有特別貢獻，但把他們包括進來，是用來防止可能引起的不滿，並給他們某種程度的尊重。隨著「美麗島」聲望帽起，封底的名單就變成一個高度令人羨妒的榮譽。至少就某種情況而言，就有一個有錢的政客願意提供一大筆捐助，唯一條件是把他名字列在那名單裡面，然而他的黨外立場畢竟稍嫌不足。此事最後終於惹來麻煩，如黃信介就被煽動，懷疑施明德擺佈他，同時也懷疑年輕知識分子對他不夠尊敬或服從。康寧祥名列社員名單中，他對此不表反對也未曾同意。不過就我所知，康從未進過「美麗島」的辦公室。

整個來說，這個結構在自由派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為核心的領導下，企圖取得所有反國民黨統治人士包括地方政客、統一派的知識分子、自由派和社會主義傾向的新生代的團結和平衡，以採取公開行動。五人領導核心的立場是台灣獨立和島內民主，這似乎是整個運動所代表的大多數意義。他們不怕在運動中包涵統派，也不怕統派的加入和支持。

在建立全島性的結構及爭取群眾基礎時，五人領導小組首先推動各地擁有政治勢力者，而在某種程度上忽略了新生代活躍分子，畢竟後者背後當然不像地方政客擁有固定而廣大的選民。但是撇開施明德、姚嘉文和總部的幹部，大部份投入所有時間的工作人員，都是大學畢業不久的新生代。因為年紀稍大、有勢力的運動參與者都有自己的家庭和事業，而雜誌無法擔保有長遠的未來，他們一般不願負全部投入的責任。

到查禁前的最後一個月，在薪餉表上尚列有五十個人。編輯、經理和工作人員的標準工資是每月一萬元，對需要養家活口的一家之主而言稍嫌不足。黃信介的榮譽職可拿到兩萬元，但很難彌補最初他拿出一百萬元的風險。此外，由於社內秘書人員、會計嚴重短缺，不得不僱用外人來幫忙。張俊宏的妹妹張美貞，從一九七九年四月施明德建立總部辦公室起，出力最多，她是唯一從政治活動路線進入組織工作的秘書。其他年輕的女性活躍分子有田秋堇和蕭裕珍，她們協助處理林義雄省議員任內面對宜蘭選民所遭遇的問題，也替林義雄研究勞工和污染等社會問題，由於沒有合適的人選，而分派文書工作給新生代活躍分子又形成浪費；因而就由姚嘉文的律師事務所借調三個秘書，每月支薪一萬五，造成社內較少政治投入反而賺錢較多的不平等效果。不過，實在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因為我們不能隨便讓背景不明的個人進入這些敏感的職務。

施明德每月收入是一萬元，但有一半花在計程車等交通費用上。我的例行性工作是擔任黨外的翻譯，並與外國新聞媒體與人權組織的接觸，到了十一月份我才掛上黨外總部「對外公共關係秘書」的正式名稱，每月領六千元，屬於「兼職」性質。

除了正式職員之外，一個複雜的義工人員系統也開始發展起來。當組織成長時，越來越多的一般人大半是上班時間不定的勞工或自僱者，通常是不同候選人的朋友，有時也前來台北幫忙幾天，或者當需要人手時過來幫忙一下。有相當大量的勞力性工作得做，包括批發三萬份雜誌給台北分銷處，運送到書店、為擴大經營而整頓辦公室設備，以及維持辦公室清潔等。工作做完後，辦公室就從附近餐廳訂購便當。雖然這些長期參與政治的工作人員沒有特殊的編、寫及管理的能力，但他們也付出相當多勞力，我們也想建立制度，至少給這些義工一些車馬費和誤餐費。不過，這個制度還來不及實行。

組織效率和薪水公平問題，應該在十月底以前就處理，但領導核心似乎非常忙於說服地方政客及未參與的、有名的知識分子加入組織，沒有時間顧及這樣的問題。對群眾運動而言，調整組織和薪資分配的重要性無庸置疑，但卻因五人小組無暇處理而沒有適當途徑可以突破當時管理上的瓶頸。

## **參與和競賽**

五人小組以外的領導者對組織也常有可觀的努力，但施明德和其他人對於能否交付他們重要任務卻常表憂慮，因為候選人彼此之間會競爭領導權。呂秀蓮即是一例。呂是一個反應機智、才華洋溢的女性，她覺得她應該成為領導核心的一員。她沒有固定職業，有充分的餘裕可以投入。她曾於一九七九年初替新生代成立一個女性主義社團，但為國民黨破壞。她之所以未進入領導核心，或許可以反映出領導者某種程度的大男人主義。

六月間，呂秀蓮自己出錢裝潢台北仁愛路的總部。靠近辦公室邊的九樓陽台，特別由裝飾用的鐵格子架圍起來，特務就不用擔心美麗島人士有可能「意外」墜樓。她選用黑白相間的圓形與格子交錯的壁紙尤其讓我們印象深刻。

不過，她好像沒有五人小組那麼敢於橫衝直撞，譬如一九七九年二月五日在桃園支持許信良的政治示威，她就缺席了。對政治犯和人權的問題，她也不夠熱心。她在黨外陣營所組織的團體，有「黨外候選人聯誼會」和「黨外婦女會」，似乎都是建立她地位的籌碼。此外，她是一位傑出的新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意識型態和姚嘉文相近，在設計團體活動的形式上她也是最有創意的，譬如她在婦女節和青年節的大會土就表現出很強的組織

集會能力。她似乎被視為組織的重要負責人，事實上她也掛著「副社長」的頭銜，不過由於競爭的緣故，她的角色逐漸被排除。而沒有發揮該有的貢獻。

個人間的競爭幾乎存在於任何組織，「美麗島」是一個以選舉政治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組織，競爭必然會存在於一聯合陣線裡頭。候選人通常尋求個人知名度和群眾基礎，以取得當選。一個人能在極權政府統治下，每天承受壓迫和威脅，他的個性必然很堅強，同時也應該具有相當的自信。但有時候某些人表達善意的動機和目標時，實際上比較關心的是維持自己的聲望和影響力，甚至超過整個民主運動的總目標，這就是政治投入者的嚴格考驗。群眾的民主運動足以掩蓋競爭對立，顯示群眾力量很大、並不因一些領導者彼此間的對抗而削弱。

在上述回顧中，從一個較大的社會力觀點、歷史發展、和領導者的意識型態入手，我們看到了一九七九年民主運動的命運被群眾運動的型式和組織的內部結構所侷限了。新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想用他們語言的力量喚起群眾的支持，然後建立一個由上而下的組織。他們的傳播線和對基層的掌控，都還稱不上是一個起點。結果在國民黨砲口一致的煽動下（如高雄事件後續狀況），他們的群眾就表現出不成熟的反應。

在這裡我想引用施明德一句話：「後悔付出追求理想的代價，就是侮辱理想」。現在大約有五十個人在牢裡，其中有很多人已經遭受不可彌補的傷害，但這些既不會減損他們的成就，當然更不是後悔的原因。

我們對他們最大的敬意是從他們的錯誤中學習改進，並以他們的成就為基礎再往前走。

### 施明德在民主運動中的角色

到目前為止，我尚未直接介紹施明德，他是「美麗島」核心領導人之一，也是唯一在分類上不屬於新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一員，因此值得我另外述之。

對民主運動的領導者而言，包容一名前政治犯，並讓他擔任中心協調人，象徵著他們挑戰戒嚴法的重大決心。大部份的政客視政治犯如瘟疫般不可招惹，即使他們也有可能遭到淪為政治犯的命運。但他們似乎以為避開了政治犯，就可以減少自身成為政治犯的可能，另一方面他們也想對當局擺出低姿態，以表示無意斷當局虎鬚。

據稱，康寧祥一九七八年就曾拒絕轉交濟助政治犯家庭的金錢。黃玉嬌就和康寧祥不同，她在海外若收到給政治犯的捐款，就轉交給施明德分發；許信良更加不同，他老早就有意和其他領導者積極尋求前政治犯的參與，並很稱心地選擇施明德做為黨外助選團總部的總幹事。

雖然施明德的背景和其他領導人物大不相同，但他仍真有很多新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特性；諸如對「文憑主義」學位本位的重視、一種個人主義的奮鬥和領導哲學、對「自由，民主」等基本政治理念的理想。高中時代他就因撰寫抗議海報被退學，導致他正規教育的學歷不高；他在獄中仍自修語言學和國際法。他鼓勵我完成社會人類學的博士學位，理由是學位可以提高我的地位，對學識的直接運用，他反而不在乎。施明德可以算是一個文人，他的歷史感和尖銳的邏輯可以在他的審判證詞中約莫看得出來。他早年進入軍校及從事地下革命組織活動，顯示出他是一個能坐而言也能起而行的人。另外在獄中，也塑造出他個性上的剛毅和果決，使他很不同於一般新中產階級知識分子。

通常政治犯獲釋後，很少會再從事政治活動。但施明德卻是少數中的一個。雖然他敏銳察覺到他所面對的危險和歧視，他仍以蘇洪月嬌競選總幹事的身分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投入公開的政治活動，化名許一文，距離他出獄（他在獄中渡過十五年牢獄生涯）僅有四個月。身為一名前政治犯，他在政治舞台上可能是一個令人害怕的闖入者。不過，一九七八年起，他一直和省議會中的黨外人士保持接觸。九月遇到雷震以後，他就建議康寧祥和張俊宏開始組黨，但他們回答說時機還沒成熟。

一九七八年中，當時施明德尚未被黨外政客接受，但他和台南神學院、台大、政大的學生接觸時，他的出現都帶給學生強烈的衝擊，似乎雙方都體認到將面臨對老一輩地方政客的挑戰。這些關係很清楚地表露在一位年輕的崇拜者所寫的〈許一文何許人也？——新生代的心聲與反省〉一文中。此文收錄於施明德所撰的《第四國會獨議》一書中。這篇短文指出，早幾年的公開領導者，如康寧祥、張俊宏等人立場不夠堅定。該文指出，「對於知識水準較高，而又相信民主政治的新生代而言，他們重視的是政治良心而非所謂的『政治智慧』，因為民主政治不需要『導師』，不需要『教父』。……許兄是讓新生代對新生前代尚具信心的泉源之一。」

在中壢事件後，有一個新領導圈子逐漸形成，他們逐漸包容施明德。如其後所顯示，施明德開始成為黨外助選團的要員，也因此他較少時間和新生代在一起。是時他的任務就是協調地方政客。

大部分的時間，施明德都是在建立組織及處理組織籌建過程所遭遇的問題。他是幕後的實際組織者和協調者，由於他和「台灣之聲」直接電話連絡，加上我和海外人權團體及外國新聞媒體的接觸，他的知名度水漲船高，海外人士比島內更清楚他這個人。

施明德經常告訴我，他所以能協調那麼多自負的領導者，是因為他已經失去公民權，由於他被宣告褫奪公權，無法成為一個候選人，也因此他不可能是其他人政治上的競爭對手；而即使他有很堅強的個性，他還是對處理黨外陣營各種不同的明星性格備感困擾。他有極高的企圖心讓對方覺得他同意他們，不管是不是真的同意，他總是很委婉地在表達他的意見。這是一種協調衝突性觀點的技巧。另一方面，他習慣性地保留，卻使得他和新生代更深入的溝通遇到阻礙，他對於自己的長期策略也多是秘而不宣。

雖然他能委婉技巧地與對方相處，但他仍置身三明治式的困境，夾在新生代和大人物之間，他「左」「右」為難。左派青年指控他向有聲望的政客的膚淺綱領投降，右派前政治犯或因妒羨他的地位而攻擊他，甚至說他是共產黨，說他在「美麗島」裡面庇護「統派」。

他很懷疑人們是否真的願意冒險保護他，因為有太多前政治犯又遭到不合理的逮捕。我想我是當時國民黨再逮捕施明德的主要障礙。

我把施明德看成是帶有強烈社會良知的台灣民族主義者，他的民族主義沒有妥協餘地。他有極度的自信，但對外省人沒有絲毫的畏懼和歧視。很多願意在日常生活上幫忙的朋友都是外省籍的前政治犯（以前的獄友、難友）。施明德從來不懷疑台灣人民推翻中國壓迫者的力量。他對人民的潛在力量有敏銳的感覺，他重視人們不服政府的反抗精神，反而不在乎國民黨傳播媒體對中上階級扭曲宣傳的效果，他並花很多時間閱讀甘地的「非暴力抗爭」理論。他把人權設想為政治上的公道，同時也是經濟上和社會上的公道。我稱他為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一個可能在他的理想國中應用極權福利計劃的人。他不是馬克斯主義者，我認為他的幾次錯誤判斷皆導因於此。他反對美、日經濟帝國主義是基於民族主義的感情，而不是建立在對國際政治和經濟關係的分析上。

長期的牢獄經驗似乎強化他沈默寡言及內向的本性，他初中同學大多記得他以前就是那副內斂的模樣。他面對和女兒生離的悲傷，連帶脊椎骨的傷長期不得治癒的痛苦，沒有人能分擔他的苦痛。除了激情地奉獻理想外，他沒有第二條路可獻身，他不希望造成任何感情的牽掛，以免入獄後負不起感情的責任，我想這是他看起來很冷漠，不太能與人分享情感的原因。

我想、黨外沒有施明德就很難有滾雪球式的發展，一般而言，自由派知識分子不易察覺國民黨統治機器殘酷的本質，因此他們太過於相信妥協談判的力量，他們的勇氣不在對「警總」提出問題挑戰，他們的氣魄不如一些政治犯，但也可能是因為這些政治犯除了一條命外，已失去一切，他們不在乎再失去什麼了。

有一個考驗就發生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台中大集會的籌備會議中，這會議為抗議吳哲朗遭逮捕而召開。逮捕令是十一月上旬發出的，罪名是鼓吹暴力，該次聚會的目的，意在防止國民黨繼續逮捕黨外領袖的威脅。

距離計聲聚會前一個星期，特務當局開始用蛇籠把台中公園圈起來，緊張於焉呈現，顯示其中將有很嚴重的對峙。當施明德提前一天抵達台中市服務處，台灣警備總部仍拒絕批准這個會議，連地方領袖也開始退縮。施明德於是給地方領袖打氣，接著去買竹製火炬，並且提出一個聲明說，如果警總連附近的太平小學也不准使用，黨外就舉行火炬遊行。直到當天黃昏，集會許可證才緩緩發下來。

這個群眾集會如期進行，地點在太平小學大禮堂及廣場，參加者達三千人左右，在燈影搖幌中，依稀可以瞧見三樓教室出現輕機槍，另有大約二百名全副武裝的鎮暴部隊懶洋洋地依靠在操場後邊的走廊上。最後，火炬點燃並由操場中間傳到前門，然後熄滅，當時大家都覺得我們的挑戰已得到勝利。

我想如果不是施明德立場堅定，勇往直前，聚會將不能如期進行。

從一九七八年末到一九七九年，施明德的個性和政治眼光已在黨外活動顯現出來，有得有失。由於負責「美麗島」每天全面性運作工作的只有姚嘉文和施明德兩人，於是在協調和決策上就出現一個嚴重的瓶頸：施明德依不同目的而用人，但卻未同時鼓舞他們發展他們自己的原創性；當然，造成瓶頸的原因還包括政治網成長過快，特務每天的騷擾，以及被逮捕和威脅的週期性危機。

在這方面，反映出黨外組織在方向上缺乏一套精確的政治哲學，和清楚而長期的政治取向。施明德雖然能調和地方領袖們從選舉政治中養成的不夠合群的個性，但仍不能把每天在工作的新生代納入第二層幹部，殊為可惜。

## 政治民主的空洞形式

相較於世界其他國家，許多國家的確擁有獨立的反對黨及一般的出版自由，但也有些國家像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墨西哥、薩爾瓦多等，其國內分別有高度鎮壓、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的分配不均的問題。實際上它們都是由「資產階級少數精英」控制軍警力量，維持鎮壓以保有他們自身的既得利益。這些精英和外資合作，聯手剝削國家的自然、人力資源，從而獲取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如美、日、英的軍事、經濟支持。精英分子代表經濟的不同領域、種族團體或地區，經常使用顯見的議會程序以謀取權力。可是這樣的「民主」只是中看不中用，它並未有真正的群眾力量，就像台灣的「經濟民主」，只是向國民黨爭

寵的經濟派系鬥爭。黨禁和限制自由出版只是統治者控制上的便利，但並非捨此不行。控制不一定要透過直接的軍警暴力。

台灣民主運動的領導者不易讀到有關其他國家鎮壓人民的詳細資料。這可能是他們本身的社會基礎使然。台灣的新中產階級已受惠於外銷經濟，在反帝分析上他們的興趣不大。他們對國民黨及美國帝國主義的勢力有多大並不是很清楚，也沒有去計畫實際的長期對抗策略。在回顧與反省裡，我們已經看到：我們無法期待這樣的運動，會有任何使台灣別於其他實施高壓「自由世界經濟」國家的後果。儘管台灣目前是相對地穩定，但當政權實際遭遇危險時，它就會直接訴諸恐怖、綁架及一律謀殺的策略。

公開組黨和公開的言論自由是發展大眾政治意識的工具，但它們不是革命策略的起點，同時它們也不能解決台灣社會目前既有的衝突。新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自由民主意識型態，已不足已應付下一階段的政治發展。

目前看來「美麗島」受刑人的妻子以她們選舉上的勝利，繼續高擎民主運動的火炬傳承下去；但我們卻不能預期她們能對民主運動再帶來什麼進步。身為民意代表，她們只能忙於選民所抱怨的大小事情。

海外台灣人一般只看到枱面上的政治人物，他們把所有的希望錯誤地寄託在他們身上。甚至在一群新一代傑出中產階級知識分子之中，我也看不出他們有什麼條件可以超越「美麗島」的成就及克服「美麗島」會犯過的錯誤。

## 鎮壓與「改革」：統治者的兩面手法

最近一次（一九八〇年底）選舉所顯示的某種勝利，除了「美麗島事件」受刑人的妻子、朋友皆站出來競選並悉數高票當選外；另一方面，國民黨本身的提名人，要想證明自己較諸黨外候選人優秀，他們在選民的支持下也開始對黨中央施壓，因而使國民黨遭遇到逐漸加深的壓力。這樣的壓力無論黨內或黨外都持續在形成，因為群眾開始鑑別堅定的與投機的黨外，這是群眾政治理解力全面進步的徵兆。但是我們不能奢望選舉的結果，會使權力分配更加公平，因為這個政權已經狡滑到開始利用選舉來分散對真正問題的注意力。是時選舉和出版管制的放鬆，已不足以形成自由化的趨勢，自由和鎮壓之間的「蹺蹊板」在過去十年來，表現得非常清楚。

台灣現已名列亞洲數個以出口經濟為主的軍人——技術官僚獨裁政權之一。位於軍事控制最高層的就是蔣經國及其親信，他們以政治、軍事力量維持剝削式的社會結構，藉之調和一個現代的、相對地繁榮的經濟體系。也就是說，最高統治階層交互運用技術官僚與心智不正常的特務，來控制社會，並為最高統治階層的最大利益工作。在台灣的某些美國外交官會戲稱國民黨特務為「尼安德塔人」（在德國發現的舊石器時代的早期猿人）。在特務眼裏，人民則是他們馬靴下的蟻，他們熟練地以恐怖為控制手段，但他們的權力仍受中央集權指揮和限制。另一方面，自由派的專家、官僚化的經濟學家及經理人員，以及他們在美國商界朋友則認為，特務系統明顯的鎮壓，經常會對外資與經濟的平穩運作有所傷害，他們認為刑求和暗殺極度地可恥，但又斷言戒嚴是「社會穩定」所不可或缺，因為只有這種假相式的「社會穩定」，才對他們有利。他們不主動反對鎮壓系統，只在政治異議者坐牢後，才擺出關懷的姿態並堅持說：「一切將逐漸改善。你看雜誌登記不就重新開放了嗎？」他們以施惠者的形象出現，並不斷往自己臉上貼金，結果贏得「國民黨開明



派」的頭銜。對於軍事買辦系統的功能上限而言，在改革的懷柔手勢之後，經常緊接著展開迅速、斷然的鎮壓報復，這正是維持整個體制的惡性循環。

未來的台灣民主運動，當務之急就是要戳破國民黨這套高壓、懷柔交互運用的統治手段。

## 後記

本文旨在分析過去台灣黨外的政治發展，特別是一九七九年年底大眾民主運動迭創高潮，這一段時期運動的社會起源和本質，為了台灣政治覺醒的長期發展，我有責任對它提出坦白地檢討和批評。這篇文章的目的不在滿足旁觀者對內幕的好奇，也不在詆毀任何人，一個客觀的評估沒有誰是全好或全壞，也就是說，沒有偶像也沒有壞蛋。

我在文章中隱含對未來努力的一個方向，惟未詳述，我目前儘量避免離開已經發生的事情太遠，以促使我們將來所做的，不再重蹈舊日的覆轍。諸如「勝利在望」、「我們必須更加努力奮鬥」等奢望的思考、草率的結論和誇大其辭的邏輯，雖然是相當普遍的趨勢，但對預測未來或擬訂實際的行動計劃，並無多大幫助。有效發展政治行動最嚴重的障礙，毋寧是台灣島內外政治經驗、社會分析和反省、檢討能力的普遍缺乏，這些缺陷都必須加緊彌補。

全文完